

「三藩之亂」與嵇永仁獄中詩歌中的歷史再現 ——兼及「詩史」書寫倫理之反思*

邱嘉耀**

摘要

嵇永仁是「三藩之亂」的死難者。學界以往主要關注嵇永仁的戲曲創作，至於其獄中所作詩歌《吉吉吟》、《百苦吟》的文學、文化史意義，尚論之未詳，有待進一步抉發。在勾稽嵇永仁的書寫自覺之基礎上，本文嘗試將其獄中所作詩歌置於「詩史」傳統加以考察，指出詩人的獄中經驗不僅成為詩歌的創作素材和摹寫對象，更使其發展出一套以污穢、不潔、鄙陋為核心的詩歌美學。此一迥異於傳統詩學的美學風格，由於嵇永仁諸子陷獄經歷的「公共性」，因而得到儒家價值觀念容納，成為「詩史」理論的特殊實踐。其後，本文參照詩歌以外其他有關其獄中生活的記載，進而通過考察諸子詩歌再現的視聽感官經驗、獄中持續進行的唱和活動，討論詩人如何對特定經驗單元加以截取與重組，並由此反思「詩史」的書寫倫理問題。本文認為，嵇永仁獄中詩歌反映「詩史」的新變，也充分體現「詩」與「史」的糾葛，以及文學與美學、倫理學之間的協商。

關鍵詞：三藩之亂、詩史、歷史再現、感官經驗、唱和、清代詩歌

* 本文寫作過程中，多方得益自師友的提問與討論。初稿曾宣讀於香港都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主辦之「新材料與新方法：第二屆文史研究香港青年學者論壇」，蒙吳志廉博士不吝指教。投稿後復承匿名審查專家及張宏生教授賜示修改方向。學友魏紅岩多次分享資料及見解，謹此一併致謝！

** 香港浸會大學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引言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吳三桂(1612-1678)殺雲南巡撫朱國治(?-1673),正式舉兵反清,揭開了史稱「三藩之亂」的序幕。¹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兵圍攻雲南省城,吳三桂孫世璠(約1666-1681)「惶懼自殺,其屬悉以眾降」。² 十二月二十日,康熙(1654-1722)頒詔天下,謂「今羣逆削平,疆圉底定」,³ 宣佈與民休息。「三藩之亂」曠日持久,歷時八年,《清史稿》有「出討三藩,勝負互見」的論斷,⁴ 康熙亦自承此役「勞師動眾,兵民困苦已極」,⁵ 對社會破壞極大。⁶ 「三藩之亂」一方面暴露出清室的內部問題(如八旗將領怯於作戰),⁷ 另一方面,則顯示出漢人官員對清廷的向心力,被學者視為清初忠君思想的一大轉折。⁸ 康熙於平定三藩後力行整飭吏治,「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且表彰忠烈,贈卹殉節

¹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史部,冊354,卷1,頁14a,總頁10;[清]魏源撰,韓錫鐸、孫文良點校,《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2,頁63;趙爾巽等撰,〈聖祖本紀一〉,《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6,頁185。

²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354,提要,頁2b,總頁2。

³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354,卷60,頁5b,總頁420。

⁴ 趙爾巽等著,〈諸王列傳一〉,《清史稿》,卷215,頁8936。

⁵ [清]清實錄館臣編,《聖祖實錄》,《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冊4,卷99,頁1244。

⁶ 「三藩之亂」所造成的人口減少、生產停滯等影響,詳參滕紹箴,《三藩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1449-1452。

⁷ 參見滕紹箴,《三藩史略》,頁1443-1449;劉鳳雲,《清代三藩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頁299-302。

⁸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著,陳蘇鎮等譯,〈從明至清的忠君思想〉,《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下冊,頁695-729。

諸臣如甘文焜（1632-1674）、范承謨（1624-1676）、朱國治、馬雄鎮（1633-1677）、傅宏烈（1621-1680）等，即為因應前述現象之舉措。⁹

在亂事平定翌年，清廷已開始修撰「三藩之亂」的歷史。康熙二十一年（1682），御史戴王縉（?-?）疏請將平亂經過匯纂成書，經內閣翰林院集議後，遂付史館纂修《平定三逆方略》，凡六十卷。¹⁰《四庫提要》謂此書「紀事精審、措詞簡括，於以彰盛烈而昭萬世，洵足媲美謨典」，¹¹《平定三逆方略》的性質和敘述立場可以藉此想見。在官方論述外，嵇永仁（1637-1676）於亂中所作的一系列詩文尤堪注意。¹² 嵇永仁長年遊幕在外，先後出任胡養忠（?-?）、祖澤深（?-?）、袁一相（?-?）、金維藩（?-?）等浙江要員的幕僚。¹³ 康熙

⁹ [清]趙翼，〈平定三逆述略〉，《皇朝武功紀盛》，收入《粵行紀事（及其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頁10。另參劉鳳雲，《清代三藩研究》，頁313-322。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計天下各官」，在職官員797員中，「從逆官」所佔比例逾三成，達240員。[清]清實錄館臣編，《聖祖實錄》，《清實錄》，冊5，卷107，頁90。趙翼（1727-1814）謂吳三桂「播流言，結死黨，以虛聲煽天下。天下皆震其威，一舉事，未有不響應者」，可為印證。[清]趙翼，〈平定三逆述略〉，《皇朝武功紀盛》，收入《粵行紀事（及其他二種）》，卷1，頁11。

¹⁰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354，卷1，頁2b-4a，總頁4-5。

¹¹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354，提要，頁3a-3b，總頁2。

¹² 嵇永仁，字留山，別號抱犢山農，祖籍常熟。父嵇廷用（?-?），晚明官中書舍人。永仁少為諸生，食餼有年，惟「屢挫場屋，鬱鬱不得志」。後以家道中落，老親垂暮，諸弟不能成立，遂出就館穀，長年遊幕在外。[清]王龍光，〈次和淚譜〉，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影印），冊145，卷6，頁1b，總頁128。永仁與金聖歎（1608-1661）、周亮工（1612-1672）友善。著有《抱犢山房集》六卷。其中《吉吉吟》、《百苦吟》、《和淚譜》，與集外《續離騷》雜劇、《雙報應》傳奇，皆為獄中所作。此外還有《揚州夢》（作於康熙九年，1670）傳奇存世。

¹³ 陸林，〈清初戲曲家嵇永仁事跡探微〉，《中國戲曲學院學報》第36卷第2期（2015年5月），頁22-27。

十二年（1673），以通家之誼，承父命入福建總督范承謨幕中。次年（甲寅，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1644-1682）反，執范承謨，嵇永仁隨同就逮下獄。陷獄三年間，永仁作《和淚譜》，「紀同難諸人顛末，以畧存其梗槩」，¹⁴ 又作詩百餘首，纂為《吉吉吟》、《百苦吟》二卷。其中別具「詩史」意義的《百苦吟》，更引發同難者范承謨、王龍光（?-1676，字幼譽）、沈上章（?-1676，字天成）三人相與唱和。然而，學者對嵇永仁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其戲曲創作，尤其是獄中所作的雜劇《續離騷》。¹⁵ 至於永仁及諸子相關詩作，學界論之未詳，¹⁶ 其間蘊涵的文學、文化史意義，仍有待進一步抉發。

在勾稽嵇永仁的書寫自覺之基礎上，本文嘗試將其獄中所作詩歌置於「詩史」傳統加以考察，指出詩人的獄中經驗不僅成為詩歌的創作素材和摹寫對象，更使其發展出一套以污穢、不潔、鄙陋為核心的詩歌美學。此一迥異於傳統詩學的美學風格，既為儒家的價值觀念所吸納，亦成為「詩史」理論的特殊實踐。嵇永仁獄中詩歌反映「詩史」的新變，在文學與歷史的關係以外，其研究價值還體現於與其他眾多

¹⁴ [清]嵇永仁，〈和淚譜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2a，總頁81。

¹⁵ 杜桂萍，〈志士情懷與嵇永仁雜劇創作〉，《清初雜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288-326；王瑗玲，〈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之劇構特質與審美形態〉，《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頁287-384；李梅，〈嵇永仁及其戲曲創作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28-40；張惠思，〈文人游幕與清代戲曲〉（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頁187-199；魏伯全，〈清初文人的邊緣書寫：以尤侗、嵇永仁、廖燕劇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年），頁83-116；張家禎，〈戲曲之「用」——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的入世姿態與自我形象建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20年），頁151-165。

¹⁶ 吳婧、賀峰，〈論嵇永仁的詩歌風格——以組詩《百苦吟》為例〉，《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2013年5月），頁48-50。另參見邱嘉耀，〈嵇永仁「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及其接受詮釋——兼論清初雜劇抒情性的文化建構〉，《臺大中文學報》第78期（2022年9月），頁209-264。

範疇，諸如文學與美學、倫理學之間的糾葛和協商。藉由此一個案，本文嘗試探問：聲音如何成為某種想像／摹寫現實的詩材？作為詩歌活動和體制形式的唱和，在擴大敘事的角度與範圍的同時，如何及為何使詩歌的「寫實性」有所削弱？經過詩人對特定經驗單元的截取、重組與再現，可能引發何種與「詩史」書寫倫理相關的問題？由於嵇永仁的創作活動與其身處的歷史情境密切相關，故以下不得不先略敘嵇永仁陷獄的始末，以及借助同難者倖存的文字，重建其獄中經驗的圖景。

二、甲寅陷獄始末

在眾多「三藩之亂」的記載中，許旭（?-?）的《閩中紀略》頗堪注意。許旭，字九日，「太倉十子」之一。其詩集《秋水集》載錄各體詩歌九十一首，收入吳偉業（1609-1672）《太倉十子詩選》（編定於順治十七年，1660）。¹⁷ 范承謨巡撫浙江時，許旭即入其幕下。在浙時，嘗為范氏捉刀，草疏請平定明鄭政權。後隨范氏入閩。時有人獻戚繼光（1528-1588）《閩中禦倭事蹟》，范承謨「日以海事為念」，以戚書「文詞質古」，遂請許旭協助點校，「丹黃而鈎貫之」。¹⁸《閩中紀略》所以值得珍視，不僅在於該書成書於「三藩之亂」前期（康熙十四年，1675），遠早於官方修纂的《平定三逆方略》，還在其以一名曾為范承謨出謀獻策、參贊軍機的下層文人視角，詳細紀錄了亂事爆發前夕的閩地形勢、耿精忠地方上的種種軍事佈置，以及范、耿二人耐

¹⁷ [清]吳偉業編，《太倉十子詩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據蘇州市圖書館藏順治刻本影印），集部，冊384，頁807-814。

¹⁸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冊279，卷20，頁9b-10a，總頁655。

人尋味卻暗潮洶湧的角力過程。

於本文而言，《閩中紀略》的特殊價值還在於其中所載嵇永仁的事跡。許旭與嵇永仁份屬同僚，隨同范承謨由浙入閩，私下也頗相友善。到閩未久，許旭以老病故，屢向范承謨請辭。辭之再三，終獲得范氏的首肯。¹⁹ 其〈別嵇留山〉一詩，當作於其出署歸家前夕。²⁰ 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許旭踏上歸途。²¹ 翌月，耿精忠隨即舉兵反清。觀許旭後來所作〈聞警遙哭范侍郎〉、〈過制府范侍郎駐兵處〉、〈追哭制府范侍郎〉等詩，可知他與范承謨二人賓主情深。²² 這些詩歌感慨與舊主天人永隔，情意淒切，頗有劫後餘生之嘆。其間感傷的情調、追悼的姿態，更延伸至《閩中紀略》全書。書中記載的這段故事頗堪注意：

稽留山，無錫人。來閩時，邑侯吳伯成餞之，酒酣作詞一章送別，調寄〈踏莎行〉。下半闕，限「翠」、「醉」、「悴」三韻，和者數人。邑侯書為一卷，攜在奚囊。制府（引者案：范承謨）見而喜曰：「吳令，文士邪！今日諸公初入閩中，即依此韻作一闕為樂。」即席，余與留山、幼譽相次成。制府微醉，援筆曰：「城郭無輝，村煙失翠，瞥然一見心如醉。遲君同作武夷遊，哀鴻待爾離憔悴。」余竊謂留山曰：「閩中千家萬戶，煙火相望，庶富如此。制府之言，何其不祥也。」留山

¹⁹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279，卷 20，頁 31b-32b，總頁 666。

²⁰ 〔清〕汪學金輯，《婁東詩派》，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據清嘉慶九年〔1804〕詩志齋刻本影印），輯 9，冊 30，卷 15，頁 8b，總頁 239。

²¹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279，卷 20，頁 18a，總頁 659。

²² 〔清〕汪學金輯，《婁東詩派》，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9，冊 30，卷 15，頁 8b-10a，總頁 239-240。

亦為蹙然。²³

「幼讐」，即王龍光，與永仁同殉難獄中。以上故事，嵇永仁〈憔悴吟序〉所敘大致相同，惟所載范氏詞作略有異文。在永仁的敘述中，諸子為其餞行時分韻所賦「孤城殘角夢家山，亂帆影裏人憔悴」之句，²⁴已使其動歸歟之念，而堪稱「不祥語」的范詞更成為其身陷苦難之先兆：

蒙谷為余解憔悴之意，亦和一詞，詞內有云：「城郭無光，村煙失翠。瞥然一見心如醉。停驂暫緩入山期，哀鴻待爾離憔悴。」余讀之驚愕，私謂許子九日曰：「言者，心之聲也。何為作此不祥語？」許子亦悚惕，相對咨嗟，知將不免，因決情而去，卒脫於難。余緣情勉留，遂逮於禍。……嗟乎！嗟乎！禍患有因，端倪先兆，今日憔悴至於此極，余固久知之矣。乃作〈憔悴吟〉。²⁵

事實上，這種進退維谷的姿態，以及雜糅其中的怨悔憾恨的情感，於永仁獄中所作詩歌和戲曲均甚為矚目。²⁶ 後來丁紹儀（1815-1884）也將范承謨這闕詞與范仲淹（989-1052）相提並論。後者「四面邊聲連角起」、「長烟落日孤城閉」二句，歐陽修（1007-1072）評為「窮塞主詞」。然而，丁紹儀認為范承謨的詞作「尤衰颯」。²⁷

²³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279，卷 20，頁 27a-27b，總頁 664。

²⁴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3b，總頁 55。

²⁵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3b-4a，總頁 55-56。

²⁶ 參見邱嘉耀，〈嵇永仁「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及其接受詮釋——兼論清初雜劇抒情性的文化建構〉，頁 222-237。

²⁷ 以上引文，見〔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收入唐圭璋彙刊，《詞話叢編》（臺北：新文

康熙十二年（1673）底，吳三桂起兵雲南。為穩定東南局勢，清廷隨即暫緩尚可喜（1604-1676）、耿精忠的撤藩令。²⁸ 面對朝廷接連遣使來閩，先後詔諭「不必搬家」、「兩翼官兵仍歸靖南王管理」，並捎來京中昆弟的家書，耿精忠益發感到不安，懷疑使者「或有別旨付總督」，是以「奉詔以後，閩府披甲三日，王亦衷甲」。²⁹ 此時已值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距離耿藩叛變僅二月而已。此後，耿精忠對范承謨的猜忌與日俱增。許旭於是建議范氏單騎前往王府，以耿母周氏（?-?）久病未癒為由持帖拜訪。當日情境，據《閩中紀略》所載：

靖南始延入，呵衛甚眾。一揖之後，移牀遠客，顏色嗔變，曰：「聞道爾幾日算計我，我也不怕爾！」制府徐曰：「我與王爺相好至戚，何怨何隙！今日特為太太尊恙，故來探視，王何疑之甚邪！」靖南顏始霽，曰：「我固無疑也。」³⁰

其戒慎恐懼如此。按照許旭的記述，在他返家以前，耿精忠屢屢違反舊例，無論是洗炮還是閱兵，既無事先曉諭居民，亦未諮詢行監督之責的范承謨。儘管許旭離署之際，耿精忠尚未與范承謨正式決裂，根據上述種種跡象，在許旭看來，「總督竟如贅疣」，³¹ 范氏最終遭難亦屬意料中事。

三月十五日，耿精忠舉兵反。《平定三逆方略》記載曰：「是日，

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3，卷4，頁2620。

²⁸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354，卷1，頁17a，總頁11。

²⁹ 以上引文，見〔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279，卷20，頁14b-15b，總頁657-658。

³⁰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279，卷20，頁16b，總頁658。

³¹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279，卷20，頁17b，總頁659。

(引者案：耿精忠)給總督范承謨會議軍事，至則執之，遂舉兵。范承謨罵賊不屈，賊幽之。巡撫劉秉政從賊。」³² 親歷其境的范承謨後來在獄中追述當日情形：

三月十五日，甲寅，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願與諸公會商為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引者案：劉秉政)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澹無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余知既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眾兵刃環臨，重加束縛。……余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激怒以速吾死，庶幾上酬主德，下報親恩。乃大罵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食死。逆每羅列飲食，予揮斥之，舌敝脣裂，齧肉俱腐。³³

是日，嵇永仁、王龍光、林可棟(？-？，字能任)及范承謨族弟承譜(？-1676)俱被執。永仁敘當日情境，謂「猙獰者」「驅之而行，如就西市」，³⁴ 最終卻被幽禁囹圄，自此不見天日。耿氏一方恩威並施，或威脅草擬安民檄，或以官爵利誘歸順，諸子皆堅拒不從。³⁵ 沈上章，亦范氏幕客，誤以為永仁等人俱死，欲為收骨歸葬，以踐前諾，亦被

³²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354，卷4，頁6b，總頁36。

³³ [清]范承謨，〈畫壁遺稿自序〉，《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輯97，卷3，頁265-266。

³⁴ 以上引文，見[清]嵇永仁，〈和淚譜一〉，《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4a，總頁82。

³⁵ [清]嵇永仁，〈和淚譜一〉，《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4b，總頁82。

束縛下獄。³⁶ 是獄罹難者凡五十餘人，然而除前述諸君，其餘姓名皆泯沒不傳。³⁷

三、獄中書寫與嵇永仁諸子之「詩史」觀

《范忠貞公集》卷九所收錄弔唁范氏之挽歌，許旭佔十二首。³⁸ 這些以回憶為主軸的詩歌，雖以個人情志之抒發為重心（如「兩月便從生死隔，三山無復笑言同」），³⁹ 仍有一定敘事成分，如許旭〈聞變遙哭制府范侍郎〉其三前半云：「仙霞井畔路漫漫，遙望天南涕淚殘。坂折驚心方躑躅，機危間髮敢盤桓。」⁴⁰ 即憶及隨范氏由浙入閩時，翻越地勢險峻的仙霞嶺之經歷。⁴¹ 倘若將「三藩之亂」的範圍稍稍放寬，擴及吳三桂叛變前夕各地已然暗流洶湧的形勢，許旭此詩大可與他的《閩中紀略》並觀，視為「三藩之亂」的當代史書寫。退一步說，即使所敘述之經驗在事件觸發之前，隨著「視界交融」（fusion of

³⁶ [清]嵇永仁，〈和淚譜三〉，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9b，總頁84。

³⁷ [清]薛鎔，〈百苦吟書後〉，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97，附錄，頁526；[清]錢儀吉，〈答張介侯書〉，《衍石齋記事續稟》，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刻咸豐四年〔1854〕蔣光燾增修光緒六年〔1880〕錢彝甫印本影印），集部，冊1509，卷3，頁3a，總頁96。

³⁸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清苑劉氏刻本影印），冊90，卷9，頁5b-9a，總頁589-591。

³⁹ [清]許旭，〈聞變遙哭制府范侍郎〉（其二），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90，卷9，頁6a，總頁589。

⁴⁰ [清]許旭，〈聞變遙哭制府范侍郎〉（其三），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90，卷9，頁6a-6b，總頁589。

⁴¹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279，卷20，頁26a，總頁663。

horizons)的必然影響，筆下文字便多少帶有作者當下的觀察和詮釋，「三藩之亂」的文學再現因而牽涉「三藩之亂」發生前的歷史經驗和事相。

然而，與廣義的歷史著述相比，以詩寫史有其特殊性和固有的傳統。自晚唐孟棨（?-?）《本事詩》強調杜甫（712-770）詩歌記載流離隴蜀時所見所聞開始，「詩史」即成為中國詩學的重要批評概念和理論資源。嚴志雄對「詩史」的義界簡易明晰，他說：「當詩史用來表示文本時，指這種作品：它具有詩歌的形式特徵，又同時內含史與詩的性質。當詩史用以指稱作者時，指這樣的作者：他既顯示了詩人的秉賦與才具，又見出史家的抱負與能耐。」⁴² 至於詩學史上的「詩史」說，其內涵因時而變，據學者統計有十七種說法之多。⁴³ 儘管如此，其基本內容即在於強調詩歌對現實生活的紀錄和描寫。⁴⁴ 根據張暉（1977-2013）的研究，自宋代開始，「詩史」說「不僅在理論上詩歌已成為歷史的史料，而且在創作實踐中很多詩人寫作詩歌的目的就是為了記載歷史」，至清初更發展到極致。⁴⁵ 這一傾向，在嵇永仁的獄中詩歌明顯可見。

嵇永仁與范承謨同日就逮，即被分囚二室，彼此隔絕。⁴⁶ 據時人記載，「公之被錮也，守卒百人。邃庵諸子之被錮也，守卒六十人。各隔絕莫通。」⁴⁷ 「邃庵」即林可棟，為此獄案僅有的倖存者，也是

⁴²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41。

⁴³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頁276-277。

⁴⁴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277。

⁴⁵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280、283。

⁴⁶ 沈上章有「髡翁另禁幽室，予輩押鎖墩房，三年磨煉，百苦備嘗」之言。〔清〕沈上章，〈百苦吟和章自敘〉，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97，附錄，頁437。髡翁為范承謨別號。

⁴⁷ 〔清〕薛鎔，〈百苦吟書後〉，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97，附錄，頁526。

保存諸子獄中文字的關鍵人物。⁴⁸ 除卻時人彙集范承謨獄中詩文而成的《畫壁遺稿》外，嵇永仁獄中所作的《吉吉吟》及與諸子賡和之《百苦吟》，成為今日還原其獄中經驗的重要憑藉。

書寫是嵇永仁重要的獄中經驗。陷獄初期，由於紙筆闕如，嵇永仁曾發出「留題觸手無斑管，得句驚魂對土牆」之嘆，其〈炭痕〉詩自註，亦云「初被繫時，禁絕楮墨，得句，以炭畫牆」。⁴⁹ 若結合〈惡紙〉、〈臭墨〉、〈敗筆〉、〈磚硯〉等詩來看，可知獄中書寫條件的惡劣。⁵⁰ 然而，註中「初被繫時」四字，也同時透露出「禁絕楮墨」、「以炭畫牆」的書寫條件後來得到改善。在〈吉吉吟引〉中，嵇永仁云：

余於積病之中，……正欲次第闡發，奈禁錮已久，病患愈深。起居之際，不能支持；著書之事，從此寢置。余之半生苦心，於鉛槧者，亦徒結來世之緣而已矣。誠恐形神一離，有筆難述，

⁴⁸ 《抱犢山房集》由嵇永仁兒子嵇曾筠（1670-1738）編纂成書。按〈抱犢山房集跋〉所載，永仁殉難時，嵇曾筠方七歲。及束髮受書，始知其父遺稿尚存。康熙四十三年（1704）夏，嵇曾筠親赴閩地，於潘宗趾（？-？）家盡得先父難中所著。潘宗趾者，乃范承謨僚屬林可棟（能任）之女婿。甲寅變起，林氏與永仁同陷於獄，後以年老而倖免。按嵇曾筠的推斷，其於閩地所得先父之遺稿，「蓋林翁垂歿而轉以付託者」。林可棟事跡見嵇永仁《和淚譜》。〔清〕嵇曾筠，〈抱犢山房集跋〉，轉引自〔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99。

⁴⁹ 以上引文，分見〔清〕嵇永仁，〈蒙谷以炭畫壁自云目之為狴犴聲〉，《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1，頁9b，總頁58；〈炭痕〉，冊145，卷2，頁12a，總頁76。

⁵⁰ 以炭書壁也是范承謨、沈上章等人的共同經驗。如范承謨就曾感嘆「欲寫新愁無寸紙」，其〈狴犴聲〉詩自註亦云：「八月十五夜，捫炭桴書獄壁，因以寄調」。在〈畫壁遺稿自序〉、〈百苦吟序〉的下款，范氏亦分明標明「炭筆識壁」、「炭筆謹識」。以上引文，分見〔清〕范承謨，〈憶紙〉，《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97，卷4，頁353；〈狴犴聲〉，輯97，卷3，頁309；〈畫壁遺稿自序〉，輯97，卷3，頁269。〔清〕范承謨，〈百苦吟序〉，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1，頁2a，總頁70。

尚就可以攤紙吮墨之時，隨意所欲吟，輒筆之於篇。⁵¹

觀乎「攤紙吮墨」、「輒筆之於篇」，可知後來他已擺脫紙筆闕如的困境。

以上引用的段落，還展現出嵇永仁以文字書寫的強烈衝動。「有筆難述」云云，不僅是對獄中書寫環境的陳述，更暗示書寫的條件與書寫的意義彼此相互關連。至此，語言的運用、修辭的鍛鍊、個人的詩學主張已非其主要關涉，書寫已逸出文學的藩籬，邁入到倫理學的範疇：書寫不僅可以體現某種倫理觀念，書寫行為本身，甚至已成為一種理應躬行實踐的倫理責任和義務。對嵇永仁來說——起碼在理論的層面——書寫的意義乃在於能否發揮出紀實的功能。相對而言，書寫主體和「作者權」將退居次要的位置。

閱讀嵇永仁等人的文字，不難看出他們對其見證者（witness）身分的認同。對他們來說，書寫所發揮的紀實功能，是彰顯其苟活人間的意義泉源。⁵² 此一心態，沈上章在其〈百苦吟和章自敘〉表露無遺：

將各寫此情，彙集一帙，付與家人，俾白髮見詩如見子，青
鬢見詩如見夫；黃口孤兒知而讀之，不能不痛絕，親戚知交
見而誦之，不能不淚下。予與諸弟兄，乃東西南北人也。今
日同處難中，有踰骨肉，異日吾儕子孫，或朝野聚會，或萍

⁵¹ [清] 嵇永仁，〈吉吉吟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2a，總頁 55。

⁵² 思念親友是諸子獄中詩歌的常見主題。在這些篇什裡，他們往往感慨忠孝不能兩全。此一倫理困境，促使他們不得不思考自己尚可作為者。由此觀之，以文字書寫，並作為見證，便發揮著某種補償的作用。這種心態在范承謨〈初度六憶〉其六（尤其是首聯和頸聯）有著充分的表現，該詩云：「寂寞孤臣天際留，夢魂猶自記春秋。傷心雁字飛紅淚，壓壁霜華染白頭。各為一人輕世難，同貽百歲老親憂。俟來雷雨風雲合，痛定依依話舊愁。」又，〈初度六憶〉共六首，按范氏自注，所憶者分別為康熙帝、母親、兄弟等人，其六則以同難諸子為對象。[清] 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3，頁 300-303。

水相逢，各敘祖宗之舊情，以詩為證，聯四海為一家，留片言於千古。予之願望畢矣，復有奚辭。⁵³

嵇永仁絕命詩〈囑林翁能任為余珍重殘詩〉中「此身若遂沈淪死，留與寒家子弟看」二句，⁵⁴ 是沈氏「以詩為證」的另一種表述，也可見其「詩史」觀念，亦即把詩歌視為歷史的特殊見證（witnessing）。對諸子來說，詩歌除了作為歷史的特殊見證，其意義也在於社群的維繫和延續。所謂「見證」，不僅關乎王龍光「拈得新詩同史讀」所指向的「寫實性」，⁵⁵ 也強調情感的傳遞和交流。如沈上章在〈百苦吟和章自敘〉的開篇即云：「詩本乎情而發為聲。古之忠臣烈士，或眷懷君父，或寓慨山川，緣機觸變，對景吟哦，後之誦其詩者，莫不想見其為人焉。」⁵⁶ 他所關注的，從創作層面而言，是情感的投注；從閱讀層面而言，則是人格的把握。在詩歌本乎性情的前提下，見詩如見人，親友為之痛絕、淚下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嵇永仁嘗自敘創作《百苦吟》的緣起，曰：

⁵³ 〔清〕沈上章，〈百苦吟和章自敘〉，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附錄，頁 438-439。

⁵⁴ 〔清〕嵇永仁，〈囑林翁能任為余珍重殘詩〉，《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30b，總頁 69。此詩可視為永仁付託林可棟的遺囑，《抱犢山房集》的編者（其子嵇曾筠）將此詩繫於《吉吉吟》卷末，也暗示出這層意思。

⁵⁵ 〔清〕王龍光，〈敗筆〉，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0b，總頁 124。王龍光對諸子所作《百苦吟》之「寫實性」及見證功能的肯認，參見其〈百苦吟和章自敘〉：「丙辰（引者案：1676）暮春，江右嵇山農先生作苦詩百篇，以記諸般惡趣。同難能任林先生、天成沈先生與予依韻而和，以共抒胸中之憤抑。他時或質諸親友，傳之都市，亦以見予輩之百折不磨，其志節有如此者。」〔清〕王龍光，〈百苦吟和章自敘〉，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附錄，頁 406。

⁵⁶ 〔清〕沈上章，〈百苦吟和章自敘〉，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附錄，頁 437。

昔人有言：「蟲生蓼中，胞胎悉苦。」余輩讀聖賢書，學經濟事，不能輝煌騰達，自行芻臆，依附得志者以行其道，此亦無聊之極思矣。迺復顛危窮迫，逼處幽羈，身體髮膚，空乏凍餓，心志筋骨，勞苦熬煎，豈天將有意大降之任耶？抑人處憂患之地，而後善心生耶？……春來筆墨久廢，迴憶兩年親歷諸景，啞然而笑，漫然為之，遂成百首，用炭屑圖於四壁。蓼蟲自語，其苦夫復何異？⁵⁷

「蓼蟲自語，其苦夫復何異」，既是文首「蟲生蓼中，胞胎悉苦」的呼應，也是對《楚辭》〈七諫·沉江〉「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的引用。⁵⁸ 王逸（約 89-158）註曰：「言蓼虫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⁵⁹ 可知「苦」之為名，固取義於苦不堪言的獄中境況，亦象徵嵇永仁「處辛烈，食苦惡」的情操，甚至成為詩歌審美特徵之概括。

接續上引〈百苦吟引〉其後的，還有以下一段，可以藉以窺見嵇永仁強烈的「詩史」意識：

同難二三子，應聲而和。真情實境，不假思索，吟者撚鬚未斷，讀者觸心即酸，聊作患難圖繪可也。三家村老撲棗打油，尚且流傳閭巷，士女謳歌，矧余輩之羽翼忠孝、砥礪名節者哉？故於詩成而系之以引。⁶⁰

⁵⁷ [清] 嵇永仁，〈百苦吟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a-1b，總頁 70。

⁵⁸ [宋] 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44。

⁵⁹ [宋] 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頁 244。

⁶⁰ [清] 嵇永仁，〈百苦吟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

其中「真情實境，不假思索，吟者鬢未斷，讀者觸心即酸，聊作患難圖繪可也」數句，明顯標舉《百苦吟》的「寫實性」，以及詩歌創作過程的「即時性」。換言之，內容（對真情實境的描摹）與形式（未經修辭化的詩歌語言）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以此故，嵇永仁獄中詩不乏紀錄忠義人物行跡之篇什。此類詩歌均追求實錄，頗有為人立傳的用意，如〈劉紀綱〉、〈李生〉即是。茲舉〈李生〉為例，大抵可概其餘。「李生」者，亦范承謨幕僚。據此詩所述，李生（?-?）其貌不揚，家貧不足以養妻，由於「下筆能文章」，蒙范承謨賞識招攬入幕，後相隨范氏入閩。被難之日，李生與嵇永仁分囚兩地，自此二人無相見之日。該詩後半所敘，乃詩人聞知李生死訊的經過，措語平淡，讀之卻覺可憐：

訊驗果非謬，加罪真豺狼。鬼薪楓亭驛，血淚灑道旁。黑獄二三子，憂汝撻鋒芒。箠楚壞筋骨，饑寒鄰死亡。近聞里巷傳，形骸尚未僵。伶仃舊妻孥，行乞共一方。我家幾千里，黯黯魂飄颺。⁶¹

細味以上詩句，不難體會詩人對同僚死於非命的無限同情。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渲染李生服役慘況的「鬼薪楓亭驛」二句，還是描摹其瀕死狀態的「箠楚壞筋骨」二句，皆為永仁擬想之辭。這些淒慘的情狀，雖非詩人所親歷親見，卻未損詩歌寫實的功能：只要合乎情理，想像與虛擬未必不可發揮紀實的效果。事實上，這亦是命在須臾的詩人不得已的書寫策略。⁶²

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b-2a，總頁 70-71。

⁶¹ [清]嵇永仁，〈李生〉，《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23b-24a，總頁 65-66。

⁶² 同樣反映出虛構與想像之間的張力，以及彼此調和之可能的作品，還有嵇永仁獄中創作的《雙報應》傳奇。顧名思義，可知此劇不乏怪力亂神和宿命論的色彩。然而，這部取材於傳聞、基於同難者轉述而創作的劇本，在嵇永仁看來，卻不無實錄的意味。嵇永仁此一創作心

儘管嵇永仁自稱其《百苦吟》堪作「患難圖繪」，限於文體，詩歌始終難以開展出相對連貫的敘事。⁶³ 其為同難者所作的《和淚譜》，宗旨是「紀同難諸人顛末，以畧存其梗槩」，⁶⁴ 一共收錄傳記四篇，傳主王龍光、林可棟、沈上章和侯全（?-?，字維垣）均為范承謨的幕客。在嵇永仁的寫作藍圖中，這便補足了詩歌相對貧乏的敘事功能。「和淚」二字，嵇永仁自言取義於文天祥（1236-1283）的詩句「只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⁶⁵ 儘管這是一場誤會，⁶⁶ 文天祥「集杜」的壯舉及其「詩史」的評價，⁶⁷ 卻使得《和淚譜》以至嵇永仁獄中創作的詩歌，獲得某種與「詩史」傳統的連結。綜上所述，可見嵇永仁深具歷史意識，對他而言，此一理念不但構成自我的認識，更主導如何理解書寫行為的意義，並貫徹於詩文乃至戲曲創作中。

態，以及該劇的創作背景，詳參王龍光所作跋文。〔清〕焦循，《劇說》，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冊8，卷4，頁163-164。

- ⁶³ 《百苦吟》以101首七絕組成，形式上可視為大型的組詩或連章體詩歌。一如嚴志雄指出，儘管組詩或連章體為敘事的開展提供更多空間，其先天的斷裂性「還是阻礙了敘述的進程」。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頁215。
- ⁶⁴ 〔清〕嵇永仁，《和淚譜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2a，總頁81。
- ⁶⁵ 〔清〕嵇永仁，《和淚譜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1a，總頁80。
- ⁶⁶ 其實這兩句的作者，或作徐世隆（1206-1285），或作王磐（1202-1293），並非出自文天祥的手筆，當是永仁記憶有誤。
- ⁶⁷ 文天祥的《集杜詩》又稱《文山詩史》。黃宗羲（1610-1695）〈萬履安先生詩序〉：「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可不謂之詩史乎？」〔清〕黃宗羲撰，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冊10，頁47。又四庫館臣〈文信公集杜詩四卷提要〉稱「每篇之首，悉有標目次第，而題下敘次時事，於國家淪喪之由、生平閱歷之境，及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一一詳誌其實。顛末粲然，不愧『詩史』之目。」〔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集部，卷164，頁4205。相關研究參見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31-232。

四、《百苦吟》中的日常敘事及污穢詩學

縱觀嵇永仁一系列「獄中書寫」，其詩歌特別是敘述獄中日常生活經驗的《百苦吟》，以及以污穢、不潔、鄙陋為核心的美學風格，尤其值得關注。以下先從詩歌所敘之日常經驗說起。⁶⁸

《百苦吟》所收錄詩歌實為 101 首，皆七言絕句。觀〈百苦吟引〉「春來筆墨久廢，迴憶兩年親歷諸景」二句，⁶⁹ 可知《百苦吟》作於嵇永仁陷獄第三年。是以其詩多屬追敘、回顧之辭，難以一一繫年。其中，尤以再現獄中環境、生活為詩歌主題之大宗。陷獄三年，嵇永仁艱苦備嘗。觀乎《百苦吟》之目，諸如「積潦」、「屋漏」、「臭蟲」、「蟣蟲」、「糞草」、「穢廁」、「蓬首」、「垢面」、「吏稽」、「乞水」，已頗可想像。囚室空間狹窄，范承謨曾言「地窄人稠，氣味鬱雜」，⁷⁰ 永仁在〈月下松濤次蒙谷韻〉亦有「憔悴二三子，兀坐室西隅。寒暑共逼仄，何時步通衢」的詩性再現。⁷¹ 「二三子」者，乃泛指同陷囹圄的同難者。至於「寒暑共逼仄」二句，出句敘述當下，對句寄望他朝，⁷² 在虛實的對照下，益覺其苦。

淪為階下囚，人身自由受到剝奪，嵇永仁曾慨嘆「踏透層冰不怕寒，如何寸步一身難」。⁷³ 此外，閩地難熬的氣候，以及獄中惡劣的

⁶⁸ 吳婧、賀峰也指出嵇詩多有記錄生活場景之篇什，見吳婧、賀峰，〈論嵇永仁的詩歌風格——以組詩《百苦吟》為例〉，頁 49。

⁶⁹ 〔清〕嵇永仁，〈百苦吟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b，總頁 70。

⁷⁰ 〔清〕范承謨，〈與諸子〉，《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3，頁 284。

⁷¹ 〔清〕嵇永仁，〈月下松濤次蒙谷韻〉，《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15b，總頁 61。

⁷² 「何時步通衢」，亦可理解為「無時步通衢」，如此一來，益見嵇永仁絕望之心境。

⁷³ 〔清〕嵇永仁，〈繫足〉，《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5a，總頁 72。永仁另外還有〈拘項〉一詩，可見其陷獄期間

物質條件，也屢屢成為同難諸子的詩材。前者如沈上章〈凍雪〉詩即有「雨晴寒濕渾無定」的感慨，⁷⁴ 又如嵇永仁〈梅濕〉詩：「作晴作雨熟梅天，江北江南氣候連。獨有海隅時序改，四時蒸透破青氈。」⁷⁵ 至於書寫囚室環境惡劣的詩篇，有永仁〈屋漏〉詩：「滴滴牀頭似淚懸，和泥和水浸衣穿。平生爾室原無愧，不透天邊透屋邊。」⁷⁶ 范承謨同題詩亦云：「椽櫺稀疎瓦不均，最宜仰臥數星辰。無端每值更深雨，四處霏霏徙坐頻。」⁷⁷ 可知囚室屋頂稀疎，遇雨即有淹浸之虞。若與永仁〈積潦〉詩「水深三尺釜生萊，人在圜中水氣埋」二句合觀，⁷⁸ 便知其言可信，並非詩家言過其實的誇飾。

蚊蟲蟲鼠之類的穢物，成為《百苦吟》藉以再現獄中惡劣環境的詩材。卷中以〈臭蟲〉、〈蟻蟲〉、〈聚蚊〉、〈飛蠅〉、〈遊鼠〉等組成的系列詩作，堪稱獄中惡物的洋洋大觀。其取材、焦點，殊非古典詩歌傳統所常見者。如〈遊鼠〉一詩云：

陰房日夜走魑魍，糞土牀前傾食盂。茶味不堪供大嚼，致教

身體上的束縛。〔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5a，總頁 72。

⁷⁴ 〔清〕沈上章，〈凍雪〉，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a，總頁 130。

⁷⁵ 〔清〕嵇永仁，〈梅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3a，總頁 71。

⁷⁶ 〔清〕嵇永仁，〈屋漏〉，《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4a，總頁 72。

⁷⁷ 〔清〕范承謨，〈屋漏〉，《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4，頁 340。

⁷⁸ 〔清〕嵇永仁，〈積潦〉，《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2b，總頁 71。范承謨〈狴狴聲〉「破紙疎櫺風直進，素娥無奈窺霜鬢」二句，雖以擬人法出之，卻不失寫實功能。〔清〕范承謨，〈狴狴聲〉，《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3，頁 309。

蹂踐到寒軀。⁷⁹

鼠輩流連遊走的路線——從排洩物到與排洩物相鄰的床鋪，再爬行到臥於床上的永仁身上——也就是他們有限而骯髒的生活空間，讀之怵目驚心。又如〈飛蠅〉詩雖沿用比興傳統，以青蠅比喻好進讒言之小人，且於末聯以「充耳至今聽否慣，飛來飛去有何能」予以諷刺，尚不能不借助自註的方式，以紀錄自己在獄中的真實經驗：「予耳常苦夜蠅飛入。」⁸⁰ 通過註釋以輔助敘事的類似例子，又如在詩題下附註「鼠曾咬予足指」的〈遊鼠〉詩。⁸¹ 與〈草褥〉、〈木枕〉等詩合觀，可知睡眠成為嵇永仁一大問題。鋪草為褥，削木作枕，詩人不得不感慨「曲肱雖是儒風味，拋却南窗此地難」。⁸²

獄中惡劣的環境，顛覆詩人固有生活秩序，又成為新的日常。日常與特殊，在艱難困頓之際形成辯證的關係，也是一組可以互相替換的概念。儘管如此，吾人披卷閱讀《百苦吟》中的篇什，恐怕仍難以不為之怵目驚心，如〈旱澡〉一詩：

探湯未熟貯烏盆，勺水人多攪易渾。去垢未曾偏惹垢，羨他江漢濯冰魂。⁸³

「去垢未曾偏惹垢，羨他江漢濯冰魂」二句，讀之可知獄中生活蘊含

⁷⁹ 〔清〕嵇永仁，〈遊鼠〉，《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8b，總頁 74。

⁸⁰ 〔清〕嵇永仁，〈飛蠅〉，《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8b，總頁 74。

⁸¹ 〔清〕嵇永仁，〈遊鼠〉，《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8b，總頁 74。

⁸² 〔清〕嵇永仁，〈木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0b，總頁 75。

⁸³ 〔清〕嵇永仁，〈旱澡〉，《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4b，總頁 72。

無限辛酸。「羨」字固映襯出其身遭之苦難，然永仁仍以「冰魂」自喻，強調自己清白純潔的本質。據此亦可推知「烏盆」之「烏」，很可能是藏污納垢所致。面對如此惡劣的衛生環境，王龍光慨嘆「自憐棲息遜雞豚」，⁸⁴ 范承謨亦將自己的處境比擬為「垢膩纍堆豕負塗」。⁸⁵ 范氏同題詩作末句，雖云「搓箇泥丸彈小匏」，⁸⁶ 語氣看似輕鬆，實則以苦為樂，不得已而已矣。

諸子苦中作樂的行為實則寄寓著某種超脫之精神，在詩歌則反映為自我嘲諷的特色。嵇永仁〈吏稽〉詩有云：

小吏停軒罪籍呈，乾坤無罪此身輕。令嚴日日來稽察，認作秋闈夜唱名。⁸⁷

按明清州縣監獄人員，大概分為官、吏、卒三等。⁸⁸ 吏是操辦具體事務的人員，除了處理刑案文書，監獄的管理諸如分班值宿、簿書登記，均屬其責。⁸⁹ 上引詩前三句自述遭受獄吏稽查訊問，為獄中生活之日常經驗，末句筆鋒倏忽一轉，將吏稽視作科舉放榜唱名。基於聲音與制度上的聯繫，「吏稽」與「唱名」得以達成修辭上的引譬連類。然於字面、修辭背後，卻是永仁面對現實中苦難時以順處逆、自得其樂的心態和精神。此一超越性，固為七言絕句形式上的要求（絕句末尾多宕開一筆），亦根植於詩人的精神境界。事實上，這種對於人間苦

⁸⁴ 〔清〕王龍光，〈昏黑〉，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2b，總頁 120。

⁸⁵ 〔清〕范承謨，〈旱燥〉，《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4，頁 341。

⁸⁶ 〔清〕范承謨，〈旱燥〉，《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4，頁 341。

⁸⁷ 〔清〕嵇永仁，〈吏稽〉，《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7a，總頁 73。

⁸⁸ 柏樺，〈明清州縣的監獄〉，《中國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2002 年 11 月），頁 123-126。

⁸⁹ 柏樺，〈明清州縣的監獄〉，頁 124-125。

難的深觀諦視，對於生命的沉思與觀照，在中國敘事詩歌的發展中，亦自有其文學與詩學上的傳統。⁹⁰

由於諸子詩作的寫實傾向，可據此大致考察出獄中的種種制度。然而，若要了解獄中審訊犯人的細節，仍須參照其他敘事性較強的記載：

難作之後，鞫者窮究章奏事，將罪余。余曰：「死何懼，但願得一見范制府，死亦瞑目。」時翁（引者案：林可棟）獨為主者呼入殿中訊之，知余不免，慷慨相向曰：「余老矣，死固其分，豈忍使目中見殺才士哉！願以身代。」⁹¹

結合相關材料，可知「章奏事」應指主張削藩或危害耿氏利益的奏議，而審訊的目的即在於查探出親與其事的幕僚。⁹²

此外，閱讀諸子詩作，可知獄中尚可進行買賣，儼然自有一套交易的機制。如嵇永仁〈劣酒〉詩，即云「盃中斷絕一年無，病裡拘牽筋脈枯。欲博微酣沽市上，酸漿贏得滿匏壺。」⁹³ 此外，王龍光、沈

⁹⁰ 柯慶明，〈苦難與敘事詩的兩型——論蔡琰「悲憤詩」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續完），《中外文學》第10卷第6期（1981年11月），頁162、165。審查人指出，「抒情正為對抗黑暗而有，幽居縹緲與鼠蚤為伍，是否也能視為這是光明之前的黑暗，詩人將由此獲得苦難的意義，進而真定一己的價值」，所言甚是。亦可參柯慶明先生所論：「於沉痛深悲之際，仍然能夠保持對於宇宙的全面觀照——這個世界並不是只有黑暗與醜惡，而是黑暗與光明混雜，醜惡與美麗交織，雖然有的時候世相似乎呈現為黑暗與醜惡的突然制勝。因而反映為一種痛苦而不絕望，哀怨而不叫囂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柯慶明，〈苦難與敘事詩的兩型——論蔡琰「悲憤詩」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續完），頁169。

⁹¹ [清]嵇永仁，〈和淚譜二〉，《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7a，總頁83。

⁹² 范承謨於獄中曾與諸子商討協助老邁的林可棟脫獄。他認為應向耿精忠一方強調林可棟「一經署中，坐尚未煖，其所陳請者，不過因兵火之後，民窮財盡，亟應拯濟以養元氣，何曾一語及他。」亦從另一側面反映審訊的內容。[清]范承謨，〈與諸從者〉，《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97，卷3，頁272。

⁹³ [清]嵇永仁，〈劣酒〉，《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

上章和作「故人買得常分飲，一陣酸風透瓦壺」、「昨夜老翁憐我病，沽來村釀未盈壺」等句，亦為其證。⁹⁴ 更明確的詩例是永仁《吉吉吟》中〈多病〉一詩：

秋來復多病，何以遣吾情。已識形骸累，難將寒熱爭。攤書頭易眩，擁被夢常驚。輒轉還需藥，持錢付老兵。⁹⁵

幽囚三年間，獄中曾爆發疫病，《百苦吟》中的〈疫癘〉為紀錄此事之作。⁹⁶ 上詩或即作於同時。觀此詩末聯，獄中諸子尚可請託獄吏購買生活所需之資，明矣。然而，不難想像，此一交易、買賣的制度自當別有運作的規則，永仁就有過貨不對辦的遭遇，其〈缺藥〉詩云：

藥椀參苓夢亦虛，買來都是草根餘。先生莫道盧扁手，嘗煞神農味不如。⁹⁷

嵇永仁精通醫術，著有《東田醫補》十三卷。一任其勝似扁鵲的回春妙手，也無法無中生有，化草根為參苓。無怪乎王龍光和詩也發出「嘗來藥味總成虛，真則無多贖有餘」的感嘆。⁹⁸

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4b，總頁 77。

⁹⁴ 〔清〕王龍光，〈劣酒〉，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3b，總頁 126。〔清〕沈上章，〈劣酒〉，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3b，總頁 136。

⁹⁵ 〔清〕嵇永仁，〈多病〉，《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27a，總頁 67。

⁹⁶ 〔清〕嵇永仁，〈疫癘〉，《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9a，總頁 74。

⁹⁷ 〔清〕嵇永仁，〈缺藥〉，《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4b，總頁 77。

⁹⁸ 〔清〕王龍光，〈缺藥〉，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3b，總頁 126。

《百苦吟》是否堪作「患難圖繪」，牽涉寫實與虛構，乃至經驗材料的來源及如何加以組織和呈現的議題，後節將有更深入的探析。然而，嵇永仁謂《百苦吟》可引發「吟者撚鬚未斷，讀者觸心即酸」的閱讀效應，⁹⁹ 大概是合乎實際的說法。如他所說，閱讀他們的獄中詩，尤其是那些不惟紀實、狀物，而透露出牢獄生涯如何動搖、摧殘知識分子之信仰、價值或心靈的篇什，往往令人心傷鼻酸。〈溺器〉詩即為其例，云：

交臂聯牀水火情，撲人洩氣逼檐楹。君非沛上真龍種，頭戴
儒冠溺不成。¹⁰⁰

此詩首聯出句「交臂聯牀」極言囚室之狹小逼仄，「水火情」則引出對句「撲人洩氣」的不堪情境。末聯反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的典故，¹⁰¹ 表面上嘲笑「君非龍種」，無法倣效沛公解冠便溺，實質以「儒冠」為象徵，婉言獄中諸子風骨依然，未因外在環境而有所斫損。事實上，范承謨〈敝席〉「徐語傍人張後幅，半遮臭氣半遮羞」二句可能更接近事實：殘破的席子是他們維持生活基本尊嚴的遮羞布。¹⁰²

〈溺器〉尚見詩人堅守儒家價值，〈乞水〉則見其信念已受到動搖。詩云：

汲綆求人渴欲烹，轆轤金井遠無聲。問余家在名泉邑，何事

⁹⁹ 〔清〕嵇永仁，〈百苦吟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b-2a，總頁 70-71。

¹⁰⁰ 〔清〕嵇永仁，〈溺器〉，《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5b-16a，總頁 77-78。

¹⁰¹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酈生陸賈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卷 97，頁 2692。

¹⁰² 〔清〕范承謨，〈敝席〉，《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4，頁 360。

虛拋抱甕情。¹⁰³

細味此詩，當可領略士人一旦身遭羈縻，其內心世界的自我詰難、質問或懷疑。嵇永仁長年寄人幕下，久無定居之所。為口奔馳的經歷，也使得他較晚才置屋。¹⁰⁴ 此外，其「抱犢山人」的別號，也多少見其守拙歸田的志趣。在此背景下回頭看〈乞水〉「問余家在名泉邑，何事虛拋抱甕情」二句，實則藉著嘲弄的語調，為自己拋卻園田生活，隨同范承謨由浙入閩，未能像《莊子·天地》中白首忘機的「為圃者」，¹⁰⁵ 從而寄寓了深沉的悔恨之情。此詩潛藏的力量顯然喚起了同難諸子的共鳴，沈上章和詩末聯「強為顏笑從人乞，不負殷勤一勺情」，¹⁰⁶ 亦從永仁詩意引申而來。王龍光的和作則更真摯動人：「貧來一勺不成烹，坐向爐頭作嘆聲。掬得半瓢猶德色，文園到此更傷情。」¹⁰⁷ 「德色」，施恩者佈施後的神色也。相傳曾任文園令的司馬相

¹⁰³ [清]嵇永仁，〈乞水〉，《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2，頁12b，總頁76。

¹⁰⁴ 嵇永仁〈上嚴灝亭先生書〉：「年來方伯袁公、廉使金公贈買山錢，始得置屋溪上。而四方之熟識某者，仍在車塵馬足問卜之，而不知某實有堂矣。」「車塵馬足問」實乃嵇永仁早年四海為家的寫照。[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5，頁24a-24b，總頁109。由此觀之，參嵇永仁〈索梵林畫〉可知其在留山堂初成之際，屢屢倩人繪圖作序，可知卜居築室對他的意義殊非泛泛。[清]周亮工，《藏畀集》，收入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冊10，卷2，頁192。

¹⁰⁵ 《莊子·天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对。」[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5上，頁433-434。

¹⁰⁶ [清]沈上章，〈乞水〉，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6，頁11b，總頁135。

¹⁰⁷ [清]王龍光，〈乞水〉，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

如(179-117 B.C.)患有消渴病，獄中資源匱乏，「一勺不成烹」，故謂「文園到此更傷情」。在獄中艱苦的環境下，一勺半瓢的淨水已變成特殊的資本，也是權力的延伸。

縱觀嵇永仁的《百苦吟》，獄中生活經驗成為詩歌的創作素材和摹寫對象，此即本節標題所說的「日常敘事」。與此內容題材相伴相隨的是一套以污穢、不潔、鄙陋為核心的詩歌美學。上文舉引之〈溺器〉詩，即為一例。此外，尚有〈糞草〉、〈穢廁〉等詩：

掃來積垢又成堆，總似閒愁撥不開。惟羨焚香郭有道，清風過處少莓苔。¹⁰⁸

萬石家風滌廁勤，顛危濁氣觸妖氛。客卿奇辱身投溷，似此何妨捉鼻薰。¹⁰⁹

與〈溺器〉相類，以上二詩均沿用某種戲仿、自嘲的修辭策略，如「掃來積垢又成堆，總似閒愁撥不開」二句，將形而上的「撥閒愁」類比為現實中的掃草撥糞，使得「撥」字重新獲得形而下的實存意涵。然而，「撥閒愁」本來就是一種隱喻或類比，如此即可視作對隱喻的破除，也就是類比之類比。至於〈穢廁〉「萬石家風」一語，則透過對作為重量單位的「石」的轉喻，指涉獄中穢物堆積的處境，亦牽涉語意的置換與翻轉。

如此內容題材，於中國詩歌史上相當罕見，由此成就《百苦吟》獨特的審美特徵。然而，歷代獄中文學書寫獄中事，亦多寫污穢不堪者。將《百苦吟》置於監獄文學發展史的脈絡中，庶可進一步定位諸

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1b，總頁 125。

¹⁰⁸ [清] 嵇永仁，〈糞草〉，《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5b，總頁 77。

¹⁰⁹ [清] 嵇永仁，〈穢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5b，總頁 77。

子獄中詩歌的承與變。監獄作為一特殊環境和空間，於其間創作的文學作品往往有著強烈的物質維度。古代文學書寫獄中事者，肇始於西漢鄒陽（206-120 B.C.）〈獄中上書自明〉、段孝直（?-?）〈上表訟冤〉等，其中尤以司馬遷（約 145-90 B.C.）〈報任少卿書〉廣為人知。至東漢時期，又有馮衍（?-?）、杜篤（?-?）、孔僖（?-?）、張俊（?-?）、虞詡（?-?）、李固（?-?）、張磐（?-?）、蔡邕（132-195）、酈炎（?-?）、胡母班（?-?）、毛玠（?-?）之作。就文體而論，漢代監獄文學則以奏章及書信為主要形式。¹¹⁰〈報任少卿書〉云：「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¹¹¹又云：「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¹¹²據此可窺知司馬遷陷獄時的苦況。

然而，相對於「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的太史公，¹¹³ 嵇永仁諸子更多的是引文天祥以自況。前述已指出嵇永仁自言《和淚譜》乃「取諸文信國『只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之句」，¹¹⁴ 此外，范承謨〈書續離騷後〉亦及於文天祥，曰：「捧讀之際，具感友誼忠懷，不禁涕泗滂沱，一見不忍再見，想伯約、信國觀此，必有餘哀也。」¹¹⁵ 然最直接的引申發揮，則數沈上章〈百苦吟和章自敘〉：

詩本乎情而發為聲。古之忠臣烈士，或眷懷君父，或寓慨山川，

¹¹⁰ 黃雅雯，《漢代監獄文學研究——以鄒陽、司馬遷、馮衍、蔡邕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16-17。

¹¹¹ 〔漢〕班固撰，〈司馬遷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62，頁2732-2733。

¹¹² 〔漢〕班固撰，〈司馬遷傳〉，《漢書》，卷62，頁2730。

¹¹³ 〔漢〕班固撰，〈司馬遷傳〉，《漢書》，卷62，頁2733。

¹¹⁴ 〔清〕嵇永仁，〈和淚譜引〉，《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3，頁2a，總頁81。

¹¹⁵ 〔清〕嵇永仁，《續離騷》，收入鄭振鐸纂集，《清人雜劇初二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頁34a，總頁67。

緣機觸變，對景吟哦，後之誦其詩者，莫不想見其為人焉。若夫文信國之過零丁、坐小樓，顛危困厄，慷慨詠歌，迄今讀「人生自古誰無死」（引者案：〈過零丁洋〉）與「變作唳鴟帶血歸」（引者案：〈金陵驛〉）之句，而不潛然下淚者，非夫也。……嗟我髡翁，真是髡子，一段光明智慧之心，慈祥愷悌之懷，其事君也忠，其事親也孝，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胡為乎遭此奇禍，遭此迍邐？餓十日而不死，歷百折而不回，與夫坐小樓者何異，寧不有黃冠故鄉之想耶？¹¹⁶

末句「黃冠故鄉之想」，據《宋史》即出自文天祥自述。¹¹⁷ 觀乎此文脈絡，文天祥於諸子的特殊意義，不僅在於遭際之相似（坐小樓的經歷），更在於其「本乎情而發為聲」的詩歌創作行為。換言之，其典範性既體現於歷史範疇，也體現於文學範疇。就歷史層面而言，諸子以文天祥自況，而未有追溯至司馬遷，大概還因為太史公以李陵（？-74 B.C.）遭囚，仍限於個人仕宦身世；文天祥陷獄三年（此與嵇永仁諸子同），則超越一己之遭際，而與家國命運相關。由此亦反映陷閩諸員視其所遭逢的「三藩之亂」，實無異於天崩地坼的動盪時刻，觀乎沈上章「髡翁為國死忠，吾儕為翁死義」之說，¹¹⁸ 亦可為印證。就文學層面而言，文天祥〈正氣歌〉的內容，諸如「風簷展書讀」的日常性，詩序鋪陳的「七氣」（「水氣」如「雨潦四集，浮動牀几」，「穢氣」如「圍溷」、「毀屍」與「腐鼠」），¹¹⁹ 均與永仁等人獄中詩歌的日

¹¹⁶ [清]沈上章，〈百苦吟和章自敘〉，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97，附錄，頁437-438。

¹¹⁷ [元]脫脫等撰，〈文天祥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18，頁12539。

¹¹⁸ [清]沈上章，〈百苦吟和章自敘〉，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97，附錄，頁438。

¹¹⁹ [宋]文天祥撰，劉文源校箋，〈正氣歌〉，《文天祥詩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冊4，卷14，頁1272-1273。

常敘事及污穢詩學，乃至其間日常與特殊的辯證關係，更有題材和主題上的延續性。

從題材和風格而論，《百苦吟》堪稱「詩史」理論的特殊實踐，反映出歷代「詩史」創作的變遷。古典詩歌崇尚比興，講究暗示和言外之意，除部分篇幅較長的古風或歌行體外，限於詩歌的體式和機制，往往難以鋪敘歷史細節。¹²⁰ 以七言絕句書就之《百苦吟》即屬此類。儘管宋人重視杜甫詩歌記載時事的功能，至於正面肯定其詩實錄當時酒價及年月地理人物；¹²¹ 賦筆的運用在詩歌批評史上歷來頗受非議，此一觀點在明中葉後尤其蔚然盛行。如楊慎（1488-1559）論杜詩，即云其中「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¹²² 於杜甫直陳時事、有欠含蓄蘊藉之作予以大力抨擊。提出「詩之不可以史為」的王夫之（1619-1692）同樣未以杜甫「詩史」為其詩歌的上乘，¹²³ 進而判別「詩」與「史」的界限，曰：「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將酷尚，而每于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於史有餘，于詩不足。論者乃以『詩史』譽杜。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是則名為可憐閔者。」¹²⁴

明清易鼎，天崩地坼，時代的板蕩不僅煥發「詩史」理論新的內涵，¹²⁵ 也直接催生大量以記載歷史為己任的詩作。相對尚比興、薄賦、修辭上以「微」著稱的錢謙益（1582-1664），¹²⁶ 其門生瞿式耜

¹²⁰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頁 215-216。

¹²¹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88。

¹²² 〔明〕楊慎撰，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上冊，卷 4，頁 213。

¹²³ 〔清〕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卷 1，頁 24。

¹²⁴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8 年），冊 14，卷 4，頁 651。

¹²⁵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177-204。

¹²⁶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頁 213。

(1590-1651) 由於陷獄殉國的經歷，可能與嵇永仁諸子更具參照的意義。¹²⁷ 永曆四年（順治七年，1650）十一月初四，孔有德（？-1652）率領清軍攻佔桂林，翌日瞿式耜被擒。¹²⁸ 就逮下獄當日，瞿式耜作〈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自誓一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八首，別山即張同敞（？-1651）的別號。瞿、張拒不降清，由是為孔有德「幽於民舍」。¹²⁹ 二人於此臨時監獄幽囚四十二日，至閏十一月十七日被害，隔屋賦詩唱和凡百餘首。¹³⁰ 據瞿式耜〈和別山韻〉其一「詩篇留血淚，千載有人知」，¹³¹ 可知其「詩史」意識。然觀其獄中詩，儘管有「殘燈一室羣魔繞」、¹³² 「拘幽

¹²⁷ 嵇永仁與瞿式耜二人的關係於學界有一從誤解到廓清的過程。按莊一拂（1907-2001）《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及徐培均、范民聲主編之《中國古典名劇鑑鑒辭典》，均言嵇永仁與瞿式耜、張同敞為友。經鄧長風考證，甲申之變時嵇永仁才八歲，瞿氏就義時亦僅十四歲，故認為此一說法不可能成立。參見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4。

¹²⁸ 相關歷史敘述參見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頁658-659。顧書原文作「1649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經檢查，永曆四年十一月初四當為公元1650年。乾嘉之際，瞿式耜的六世族孫瞿頡（1743-約1818）創作《鶴歸來》傳奇，以戲曲的形式再現其先祖事跡，如其中〈抗節〉一齣即敷演瞿式耜遭受審訊的經過。此劇文獻來源、敘述策略之詳細探討參見陳亮亮，〈乾嘉戲曲中的南明忠臣再現：瞿式耜與《鶴歸來》〉，《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0年第1期（2020年1月），頁51-60。

¹²⁹ 〔清〕張廷玉等撰，〈瞿式耜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80，頁7184。

¹³⁰ 黃海章，《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25。

¹³¹ 〔明〕瞿式耜撰，〈和別山韻〉（其一），收入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42。

¹³² 〔明〕瞿式耜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自誓一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其一），收入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頁232。

土室豈偷生」、¹³³「何事俘囚學楚囚」、¹³⁴「七尺那堪斗室蟠」之句，¹³⁵於獄中境況僅作點到即止的描述，未如嵇永仁諸子一般，就其觸目所及，直書其事，且不避污穢不潔之物事，鋪排至於百首。相對而言，瞿詩更多的是展現個人氣節，如以孤臣孽子之姿態，嘗試召喚、比擬歷史上蘇武（140-60 B.C.）、文天祥一類忠臣的典範。¹³⁶

李復（1052-?）曾於〈與侯謨秀才〉指出「詩史」內容與形式上的關聯：

杜詩謂之「詩史」，以班班可見當時事。至於詩之敘事，亦若史傳矣。……若欲解釋其意，須以禮義為本。蓋子美深於經術，其言多止於禮義。¹³⁷

所謂「解釋其意」乃就侯謨（?-?）擬為杜詩「所用事實」作註而

¹³³ 〔明〕瞿式耜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自誓一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其六），收入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頁 234。

¹³⁴ 〔明〕瞿式耜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自誓一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其八），收入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頁 234。

¹³⁵ 〔明〕瞿式耜撰，〈自歎示別山〉，收入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頁 241。

¹³⁶ 「蘇卿絳節唯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殘燈一室羣魔繞，寧識孤臣夢坦然？」見瞿式耜撰，〈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自誓一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其一），收入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頁 232。然而，瞿式耜陷獄後的心境是複雜的，張暉即指出「大家都強調瞿式耜的忠烈，似乎遺忘了瞿式耜是如何通過從容來平靜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並著力分析其詩一波三折的心理狀態，以及如何思考死亡的價值和意義。張暉，〈死亡的詩學——南明士大夫絕命詩研究〉，《文學評論》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7 月），頁 136-138。

¹³⁷ 〔宋〕李復，〈與侯謨秀才〉，《潘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集部，冊 1121，卷 5，頁 15b，總頁 50。

言。¹³⁸ 李復調杜甫「深於經術」，其詩「止於禮義」，實則反映出「詩如其人」的傳統觀念。無論如何，李復對「禮義」的強調，還是揭示出「詩史」說溫柔敦厚的風格理想。由此觀之，《百苦吟》特殊之處在於，它一方面有乖於「詩史」普遍推崇的語言風格，另一方面又為儒家的價值觀念所吸納，成為清初「詩史」說的特殊實踐。

不過，從人類學的觀點看，此一看似弔詭甚至矛盾的現象其實順理成章。在《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中，英國人類學家 Mary Douglas (1921-2007) 指出：「污穢從來不是孤立的。只有在一種系統的秩序觀念內，它才會出現。」¹³⁹ 對嵇永仁來說，其身遭苦難，本來就是「三藩之亂」歷史的一部分。故此，對污穢、不潔、鄙陋之物，也就是諸「苦」之書寫，自然為作為整體的文學傳統所容許。此一理路背後，更深一層的邏輯是：道德倫理先於文學技術，紀實功能勝於藝術功能，後者諸如字面的選擇、修辭的運用乃至風格的建立，在動蕩的歷史時刻，均屬第二義。¹⁴⁰ 更何況，一如龔鵬程所言，「詩史」本身就「代表一種價值觀念」，並寄寓著「作者的人文精神與文化理想」。¹⁴¹ 觀乎上引〈穢廁〉末聯「客卿奇辱身投溷，似此何妨捉鼻薰」二句，¹⁴² 詩人顯然注意到其「客卿」身分與「奇辱」之間的張力，展

¹³⁸ [宋]李復，〈與侯謨秀才〉，《澗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1121，卷 5，頁 15b，總頁 50。

¹³⁹ [英]瑪麗·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著，黃劍波、柳博賢、盧忱譯，《潔淨與危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頁 52。

¹⁴⁰ 所謂「第二義」，乃就價值之層級而言，一如「德」先於「言」。其實，嵇永仁並非沒有嘗試調和題材與風格之間的張力，如藉由典故的運用，就多少使得其詩作趨近中國古典詩論所追求的「含蓄」或「意在言外」的審美風格。相關研究參見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

¹⁴¹ 以上引文，見龔鵬程，〈論詩史〉，《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32。

¹⁴² [清]嵇永仁，〈穢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

現出某種自我砥礪與自怨自艾的曖昧與游移。可見道德倫理本身已成為《百苦吟》反思的對象。是以《四庫提要》對嵇永仁的評價，亦著眼於身分及其分際，謂「永仁以諸生佐幕，尚未授官，而抗節殞身，義不從逆」。¹⁴³ 至於時人刻意強調范承謨《百苦吟》和作的倫理價值，並將他納入忠臣孝子的譜系，其理亦同。如郭棻（1622-1690）曰：

於戲！公寧以詩文重哉！然言者，心聲也。忠臣孝子，胸臆鬱勃而口不能宣，或託之乎辭賦，或形之乎咏歌，隻字片楮，皆至忠大孝之所寓焉。……《百苦》諸章，懷君親、念昆弟、勗婦子、謝友朋，至性所流，光昭星日。¹⁴⁴

對《百苦吟》中極力描摹的污穢書寫視而不見，毋寧是有意識的「誤讀」。無論如何，嵇永仁獄中詩歌語言、題材以至主題上與詩學傳統的乖離，及此一看似弔詭的現象背後的觀念基礎，即為《百苦吟》作為「詩史」的特殊意義所在。

林紓（1852-1924）曾在〈利倬瑟戰血餘腥記序〉回顧古代中國歷史著述中的戰爭書寫，曰：

余歷觀中史，所記戰事，但載軍帥之攄略，形勝之利便，與夫勝負之大勢而已，未有瞻斂卒伍生死饑疲之態，及勞人思婦怨曠之情者，蓋史例至嚴，不能閒涉於此。雖開寶詩人，多塞下諸作，亦僅託諸感諷，寫其騷愁，且未歷行間，雖空構其象，終莫能肖。至《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於亂離之慘、屠夷之酷，纖悉可云備者。……吾華亂中筆墨，

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5b，總頁 77。

¹⁴³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集部，冊 1319，提要，頁 1b，總頁 199。

¹⁴⁴ 〔清〕郭棻，〈范忠貞公文集序〉，收入〔清〕范承謨，《范忠貞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90，郭序，頁 1a-7b，總頁 413-416。

雖求如《嘉定》、《揚州》之記，亦不可復得矣。¹⁴⁵

這一段深具啟發性的文字，有兩點可以注意：第一，歷史著述的體例和傳統對書寫內容的限制，此即所謂「史例至嚴，不能閒涉於此」。第二，指出開元、天寶年間邊塞詩人大多「未歷行間」，筆下所敘史事，實乃「空構其象」。後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盛唐詩研究有進一步的闡發，他說：

安祿山率領東北軍隊反叛是八世紀中葉的中心事件。盛唐詩人不可能沒看到它的重要性，但八世紀五十年代的重大事件卻很少被寫進詩歌，這一事實主要是關於詩歌本質的普遍觀念在起作用，……戰爭只能在送別、個人敘述及遊覽戰場的詩中順便提及。¹⁴⁶

另外，儘管林紓意在比較中、西文學，此番言論，仍可啟發我們思考歷史再現的媒介與文類問題。以文字——尤其詩歌——再現歷史，往往受到文類傳統的制約。邊塞詩「託諸感諷」、「空構其象」的現象似乎說明，經驗與內容之間的斷裂並未斫損「詩」之為「史」的性格。易言之，「詩史」與想像之間未必相互扞格。如此一來，便衍生出透過詩歌再現歷史時，經驗材料的來源、組織及其倫理等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將於下一節接續探討。

¹⁴⁵ 朱義胄述編，《春覺齋筆記》，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第4編，冊94，卷3，頁17。

¹⁴⁶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頁224。

五、歷史的詩性再現：經驗材料的來源、組織及其倫理

高友工(1929-2016)參照以分析哲學為基礎的語言哲學、知識論和方法論，¹⁴⁷ 指出從語言表現的層面而言，「現實之知」與「經驗之知」並無二致。原因在於，無論是前者所追求的客觀真理，還是後者所強調的主觀經驗的體現，都必須經過語言此一媒介方能夠表現出來。¹⁴⁸ 然而，「現實之知」以實際功用（再現經驗世界的現象）為終極意義，「經驗之知」則與實際功用絕緣，把目的寄託於經驗的內向觀照（作為心理活動的觀賞和反省）之中，即此而言，又可謂迥異。¹⁴⁹ 歷代「詩史」說或強調「敘事」，或強調「抒情」，¹⁵⁰ 雙方爭持不下的原因，固然是對詩歌本質理解有異，更可視為對於詩歌的認識功能，也就是應該反映「現實之知」抑是體現「經驗之知」之間的分歧。換言之，兩者的根本差異，在於關注語言所指稱、模擬的現實生活領域的種種歷史現象，還是與經驗密不可分的作為表現形式和媒介的語言本身。

由於抒情文化傳統的巨大影響，在中國詩歌批評史上分別強調敘

¹⁴⁷ 陳國球，《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頁92-93。

¹⁴⁸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8。

¹⁴⁹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頁5、9-10。高友工另外又指出：「抒情美典不僅以為這只是活動而已，實際上它的整個過程即是『美感經驗』的本身。而以後的欣賞的目的即是在重新捕捉這個『經驗』」，又說：「經驗並不是我們過去或現在的感受，而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對這種感受的一種反省。……只有事後有意無意重新湧現，這些回憶才成為經驗。」高友工，〈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頁94、98。

¹⁵⁰ 參見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280-285；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頁43-46。

事和抒情的「詩史」說在清代逐漸合流。¹⁵¹ 這是理論的發展趨勢。在實踐層面，嵇永仁及諸子強調詩歌紀實功能的主張和他們的獄中詩歌，便為我們提供某種對照（不必是印證）的視角，反省以詩歌再現歷史時，詩人可能面臨的諸如經驗材料的來源、組織及其再現的倫理等一系列與「詩史」說密切相關的問題。以下，將從作為詩材的聲音說起。

視聽經驗是獄中諸子最常於詩歌再現的感官經驗。范承謨〈兩齋即事〉堪為代表，詩云：

遙辭瀛海展洪圖，何意一朝鱗甲孤。戶暗織蛛腸屈曲，墉穿牙鼠夢模糊。片牕百孔風聲碎，斗室千光燈影殊。最是雨餘牀似洗，月搖寒浪浴冰壺。¹⁵²

通過大量意象的排比，范氏此詩庶幾把律詩以名詞性實字為主的表述結構展現無遺。¹⁵³ 「戶暗織蛛」、「墉穿牙鼠」等語呼應嵇永仁〈遊鼠〉等系列詩作，可視為上文論述獄中惡劣環境的佐證。不過，此詩最值得注意的是頸聯。「片牕百孔風聲碎，斗室千光燈影殊」二句，表層刻劃的是窗櫺破落、燈火明滅，其引人入勝之處，卻在於反映出幽於縲紲者官能上的敏感。在這闕以名詞性表述結構組織詩行的七言律詩裡，視聽的雙重感官為讀者呈現出一幅動態的獄中圖景，也暗示出夜中不能寐的詩人形象。「雨餘」、「月搖」、「浴冰壺」中的動詞（餘、搖、浴）固然表現了時間的流動，「風聲碎」、「燈影殊」可能在詩歌意境的營構上更為關鍵，因為它們意味著一個感受主體的存在。

監獄是一個特別的環境，身在其中，能夠見到的景象有限，也導

¹⁵¹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284。

¹⁵² 〔清〕范承謨，〈兩齋即事〉，《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3，頁 292。

¹⁵³ 高友工，〈律詩的美學〉，《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頁 238。

致聽覺的高度靈敏。這在嵇永仁《百苦吟》頗有表現：

慟哭誰憐阮籍窮，空將壯志負桑蓬。孤燈此夕更籌永，腸斷
東風聽曉鴻。

每到雞鳴睡不安，五更心事半生難。起來怕見猙獰面，一枕
天涯夢已殘。¹⁵⁴

前詩題為〈除夜〉，後詩題為〈昧旦〉。二詩詩意顯豁，均著力刻劃輾轉反側的情態，一言以蔽之，即王龍光「長嘆中宵恨自知」的意思。¹⁵⁵ 由此可見牢獄生涯除了銷磨陷獄者之「形」，還影響其「神」。¹⁵⁶ 更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佇聽曉鴻（腸斷東風聽曉鴻），還是聞雞而起（每到雞鳴睡不安），不應只視為抒發情感的意象素材，而應該認識到，這些聲音正是詩人實實在在的聽覺經驗，並與其精神狀態息息相關。換言之，心靈的敏感不安與發達的視聽官能彼此相關，甚至互為因果。嵇永仁〈風鶴〉詩「亂世如絲性命微，驚傳消息是耶非」二句，¹⁵⁷ 便將「性命」與「消息」關聯並置，聽覺不僅在經驗層面發揮感知和認識的功能，還成為動蕩時代某種測量人生方向的指南。憑藉音聲，詩人由是辨認出時間的流逝，「刀尺聲中歲月非」（〈聽砧〉），更彷彿親見「危城氣勢觸蠻煙」（〈砲警〉），而外間亦早已「白骨如山

¹⁵⁴ 以上引文，分見〔清〕嵇永仁，〈除夜〉，《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6b，總頁 78；〈昧旦〉，卷 2，頁 3b，總頁 71。

¹⁵⁵ 〔清〕王龍光，〈蓬首〉，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3b，總頁 121。

¹⁵⁶ 久陷囹圄，飲食不繼，嵇永仁嘗慨嘆「神瘁形枯」（〈垢面〉）。此外，其〈蓬首〉詩「短髮和愁共作絲，鏡中搔首嘆迷離」二句，亦為其例。〔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4b，總頁 72。

¹⁵⁷ 〔清〕嵇永仁，〈風鶴〉，《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6a，總頁 73。

臥戰場」(〈隣哭〉)。¹⁵⁸ 基於詩歌與歷史的互文性，我們自然能夠推想：嵇永仁在構思〈聞柝〉一詩時，也許會回憶起許旭曾跟他說過：聞地柝聲何其不祥，「宛然『打殺哉』三字」。¹⁵⁹

這些基於聽覺經驗再現「三藩之亂」的詩歌促使我們叩問文學的虛實問題。無論是「以詩為證」(沈上章語)、「拈得新詩同史讀」(王龍光語)還是「聊作患難圖繪」(嵇永仁語)，諸子在在強調其獄中詩歌的「寫實性」。較諸「青史將來識姓名」或「永壽芳名紀青史」所展現名留青史的自信，¹⁶⁰「以詩為證」等語的關懷，毋寧在於文學與歷史的緊密關係。然而，無論揆諸常理或考諸事實，諸子久陷獄中，實無目睹戰場上諸如「危城氣勢觸蠻煙」、「白骨如山臥戰場」或「邊軍回首望長安」的可能。¹⁶¹ 我們固可援引王國維(1877-1927)「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的說法，¹⁶² 乃至當代學者有關經驗的「想

¹⁵⁸ 以上引文，見〔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6a-6b，總頁 73。

¹⁵⁹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279，卷 20，頁 25b，總頁 663。

¹⁶⁰ 以上引文，分見〔清〕王龍光〈吏稽〉，收入〔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6a，總頁 122；〔清〕范承謨，〈勾留吟〉，《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4，頁 311。

¹⁶¹ 以上引文，分見〔清〕嵇永仁，〈砲警〉，《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6b，總頁 73；〈隣哭〉，冊 145，卷 2，頁 6a，總頁 73；〈笳吹〉，冊 145，卷 2，頁 7a，總頁 73。

¹⁶² 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卷上，頁 2。

像性」，¹⁶³ 或文學語言內建的「虛構性」之觀點，¹⁶⁴ 嘗試加以解釋或辯護；卻無可否認，如何判別和釐析「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界線，在「詩史」說的理論內部至為關鍵，問題核心亦與文學（詩歌）語言抒寫之經驗，必然經過作者（詩人）的剪裁、調整或自我解釋，所屬範疇、層次不盡相同。原因不僅在於「詩史」定義上必然內含的歷史性質，更在於此一概念建立之初，就具有且體現出某種德性價值。詩人一旦透過其「想像性感官經驗」再現歷史，¹⁶⁵ 便須要受到是否合乎歷史之再現倫理的檢驗。因此，我們有必要考察嵇永仁及諸子身處的經驗世界，也就是他們獄中具體的處境，重新審視其詩歌如何就特定經驗單元加以截取、重組和再現。

考察諸子獄中的自由程度，是否符合薛鎔（?-?）所謂彼此「隔絕莫通」的說法，或許可以成為反思的起點。譬如說，閱讀其獄中詩歌，可知他們即使淪為階下囚，似乎尚有童子可供差遣。嵇永仁〈執爨〉詩云：

析薪炊火度時艱，童子呼來鈍且頑。不若親身猶省力，寒暄

¹⁶³ 如高友工：「我們無意中親身所作所為，不為我們自己意識到，則談不上經驗。……如果我們目睹一事，雖非身歷其境，則也可以稱為切身的經驗。甚至於，即使只是我們想像所得的印象，若能鮮明地呈現於意識層上，那也是經驗材料。」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頁 23。

¹⁶⁴ 蔡英俊承接高友工〈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的觀點，對此一問題有通達詳明的申論：「詩歌就是省視自我當下經驗而來的一種觀照方式，但也因為內化，所以經驗的意義或價值就不免是自我解釋的；同時，也因為象意，所以經驗的自我解釋就不免是要透過喻示而間接傳達的了。」又說：「詩總是詩，在文學形式與規則的支配下、在詩人身分與創作理念的制約下，情緒感受與心境不免是模寫的焦點與材料，因此總是事件過後經驗的沉思與解釋，而不會是關於事件本身的闡明與敘述。……歷史事件的具體性與真實面向，不免就在詩文創作本身的符號系統操作下，進行意義的『隱喻性替換』。」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 3 期（2009 年 12 月），頁 249、251。

¹⁶⁵ 此一表述借用自許暉林，〈物、感官與故國：論明遺民董說《非煙香法》〉，《考古人類學刊》第 88 期（2018 年 6 月），頁 103。

冷暖各相關。¹⁶⁶

《百苦吟》中與煮食、烹飪有關的篇什甚多，如〈砂鍋〉、〈竹刀〉、〈覓火〉、〈摘菜〉、〈食淡〉、〈滌器〉，¹⁶⁷ 或題詠煮食器具，或敘寫烹飪過程，至於嗟嘆煮食環境不堪、飯菜淡乎寡味，也是相關作品的題旨。然而，在王龍光、沈上章各自感慨「求人水火亦維艱」、「三年習得面皮頑」的時候，¹⁶⁸ 嵇永仁何以能夠嫌棄童子「鈍且頑」？

對此，范承謨〈囑序公〉提供了某種程度的解答，該文說：

二年來，凡有自堂中至者，必問爾何所事事。不曰「持咒誦經」，則曰「下棋看牌」，想亦無聊之極，借此收攝身心，排悶鬱燥耳。但為時已久，從未聞片紙隻字示人，將謂珍重珠玉龍蛇，不肯輕留人世乎？抑如諺語云「一枝斑管千鈞重，半幅花箋百尺長」乎？我在此間，既無師友，又乏詩書，尚爾持蘆畫沙，覓炭塗壁，以消歲月。爾幸羣賢聚首，圖籍滿前，何不折節下士，執經問業，稍求裨益，乃甘為碌碌庸流乎？抑俟難滿，或為緇衣，或為黃冠，或為荷戈卒，或為賣菜傭，以終此身乎？¹⁶⁹

「序公」者，當指許旭《閩中紀略》提及司職倉房，范承謨撫浙時即

¹⁶⁶ [清] 嵇永仁，〈執爨〉，《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3a，總頁 76。

¹⁶⁷ [清] 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9b-14a，總頁 74-77。

¹⁶⁸ [清] 王龍光，〈執爨〉，收入 [清] 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2a，總頁 125。[清] 沈上章，〈執爨〉，收入 [清] 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2a，總頁 136。

¹⁶⁹ [清] 范承謨，〈囑序公〉，《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3，頁 282。

「令之隨任」，並「憐其壯年客旅，以一婢贈之」的范序公（?-?）。¹⁷⁰ 范承謨被難後，多以孤臣孽子形象呈現於其詩文。在〈囑序公〉這一封信札（也可能是一則便條）中，他卻表現出與之迥異的形象：他以揶揄、挖苦又不失溫馨的語氣，訓斥這位無所事事、不思進取的屬下，並在後文敦促（或亦近於命令）對方「自為振拔」，¹⁷¹ 多向嵇永仁請益。更重要的是，此信透露出范承謨以外諸子雖被囚禁堂中，尚可「下棋看牌」以作消遣，還有豐富的圖書可以閱覽。

從寫作意圖而言，〈囑序公〉所言即所指，實用性壓倒文學性，顯然以資訊交流為目的。然而，相比「聊作患難圖繪」的《百苦吟》，范承謨此信不但意外紀錄了諸子獄中經驗的另一面向，更揭露出文學語言的修辭性，以及此一性質與見證所要求的「寫實性」之間的張力。即使作者是親歷其境的局中人，其記載亦會因應文體成規、發言語境、受文對象等種種因素，而造成敘述上的干擾，甚或失真。由此可見，文學（詩歌）往往是作者（詩人）對特定經驗（事）的截取、重組與再現，出於各種原因（如表現出特定價值認同和形象），部分事態或經驗單元因而獲得呈露或強調的機會。譬如說，嵇永仁「以炭畫牆」之自述，¹⁷² 便為其書寫行為賦予嚴肅的道德意涵，然此一現象，顯然與其豐富的創作成果（如嵇永仁獄中所作《雙報應》傳奇即長達三十齣，且齣末下場詩均集唐而成）有一定程度的牴觸。這提醒我們：歷史化一個僅見載於文獻的歷史人物，並重構其形象和處境，何其困難，同時何其重要。學者曾指出，明代的刑事和行政系統有其任意性，在某些情況下，被囚禁的官員可能在未經正當程序的情況下被監禁和

¹⁷⁰ 以上引文，見〔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279，卷 20，頁 30b，總頁 665。

¹⁷¹ 〔清〕范承謨，〈囑序公〉，《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3，頁 282。

¹⁷²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2，頁 12a，總頁 76。

釋放。此外，監禁的條件亦因人而異，但普遍能夠與家屬和探訪者往來，也有接觸、閱讀書籍的機會。¹⁷³ 儘管「三藩之亂」屬特殊時刻，獄制與承平時當存在各種差距。不過，考察相關文獻，明顯可見諸子幽囚三年期間縱或受過拘項、繫足之苦，監獄不完善的機制，或獄吏執行制度時並不徹底的態度，卻為被囚者保留相當的自由空間。¹⁷⁴ 在束縛與自由的夾縫中，獄中諸子互通消息、彼此救濟，形成具凝聚力的社群。¹⁷⁵ 然而，歷史弔詭之處在於，若非仰賴嵇永仁及諸子獄中的詩文創作，並不可能重塑他們的獄中經驗。¹⁷⁶ 文學與歷史於此大幅度地重疊。

諸子獄中的唱和活動從另一層次揭示：在寫實導向的文學書寫中，「虛構性」其實無可避免。嵇永仁創作《百苦吟》後，范承謨、王龍光、沈上章、林可棟均有和作。惟林可棟和章今已散佚，范氏所作

¹⁷³ Ying Zhang, *Religion and Prison Art in Ming China (1368-1644): Creative Environment, Creative Subject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0), p. 7. 這種隨意性，又見於禁囚衣糧的配給和刑具的使用上，參見柏樺，〈明清州縣的監獄〉，頁 130-133。

¹⁷⁴ 嵇永仁等人於甲寅三月十五日就逮下獄，遲至三月二十八日，被另行幽禁的范承謨便開始跟永仁諸子通信聯繫，根據該信件的內容，他們所以能夠互通消息，是由於得到某獄卒的協助。〔清〕范承謨，〈與同難諸子〉，《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卷 3，頁 275-276。

¹⁷⁵ 嵇永仁有〈祝子再賡贈被〉、〈毛子賓留除夕在禁寄饋燭炭〉、〈病中三日不殮矣，林翁為余治羹，感而賦贈〉等詩，皆見陷獄眾人皆彼此救濟援助。分見〔清〕嵇永仁，〈祝子再賡贈被〉，《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1，頁 24b-25a，總頁 66；〈毛子賓留除夕在禁寄饋燭炭〉，冊 145，卷 1，頁 20b-21a，總頁 64；〈病中三日不殮矣，林翁為余治羹，感而賦贈〉，冊 145，卷 1，頁 25b，總頁 66。

¹⁷⁶ 張穎在其有關明代監獄文學與文藝的先行性研究中指出，相對易於腐朽的物件（它們有特定的儀式功能），書寫於獄中的著作是歷史學家考察前現代獄政和監禁者的生活經歷之主要憑據，惟這些文獻往往包含偏見和遺漏，有欠透明。此外，其得以書寫下來、保存甚至出版，往往有其偶然性。Ying Zhang, *Religion and Prison Art in Ming China (1368-1644): Creative Environment, Creative Subjects*, p. 10. 此一現象其實有相當普遍性，非古代中國為然。書寫與見證關係的當代反思參見潘怡帆，〈見證，或文學的任務〉，《中國現代文學》第 39 期（2021 年 6 月），頁 7-24。

載於其別集，王、沈二氏的和作則附錄嵇永仁文集之後。¹⁷⁷《百苦吟》各詩皆專詠一物一事，受限於絕句的體式，詩人發揮的空間本來就不大。至於諸子和作，既為題目所限，又拘拘於步武原詩韻腳，詩意空間便相對變得狹窄。除了對唱和形式的解縛（拒絕一一步韻），范承謨還從詩題的改寫覓得額外的表意空間，比對其和作與原詩題目，有以下差異：

表一：嵇永仁、范承謨《百苦吟》詩題比較

嵇永仁《百苦吟》原詩題目	范承謨《百苦吟》和詩題目
木枕	破枕
惡紙	憶紙
臭墨	憶墨
敗筆	憶筆
磚硯	憶硯
殘書	殘曆
覓火	滅火
昆弟	六弟
憶內	病室
思兒	兩兒
同宗	吾宗

儘管和詩詩題與原作大多僅一字之差，亦可窺見詩題如何在嚴格的唱

¹⁷⁷ 參見嵇曾筠〈附刻同難二先生詩文序〉：「使當日同難執友，俄焉隱沒，必非先君子意。因復掇兩先生詩文若干另刻之，次第合成六卷，庶後人知一時周旋患難所由，並徯良史，昭賁無極，區區感舊之私，亦少慰先君子云爾。」按《抱犢山房集》共六卷，王龍光、沈上章詩文即附刻於卷六。〔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卷 6，頁 1b，總頁 119。

和體制中，發揮某種表意的功能。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上表不過展示出部分例子。范承謨《百苦吟》一卷，並無賡和原作〈惡夢〉以降的〈元旦〉、〈清明〉、〈至日〉、〈除夜〉、〈撫棺〉、〈受業〉和〈同社〉；而多出〈哭友〉、〈哭僕〉、〈吞蠶〉、〈歎鼠〉、〈雪異〉、〈葩妖〉、〈祝茶〉、〈煮茗〉、〈諭僕〉、〈酌醉〉、〈話醉〉、〈格鬪〉、〈覓炭〉、〈長兄〉、〈蘇公〉、〈允公〉、〈彥公〉一系列新題作品。¹⁷⁸ 這現象一方面說明諸子獄中經驗各自的差異，也反映出詩歌唱和的文化意涵——相對諸子擁有較高地位的范承謨，大概更能夠突破原詩固有體制的束縛。

范承謨的和作似乎為以下觀點提供有力的證明：作為詩歌活動和體制形式的唱和，有助擴大敘事的角度和範圍，進一步確認嵇永仁其詩堪作「患難圖繪」之聲稱。然而，唱和內蘊的悖論是：一方面，得益於不同唱和者的參與，敘述視點變得多元，經驗和事件本身更可能以一種相對連貫、完整的結構再現；另一方面，由於同題共賦的形制以及唱作活動天然的社交性，¹⁷⁹ 或造成社群成員的消極應對，和作亦未必充分具備「寫實性」，遑論史料的價值。這類例子——無論是語意抑或文學修辭技巧的因循——在諸子的和作中比比皆是。

本文無意站在虛無主義的立場，否定歷史有其再現可能，或泯滅不同敘述之間，相對於真實而言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寫實性」。儘管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獲得「詩史」稱譽的第一人，其詩作的「寫實性」並不是無可非議，沈洵（?-?）〈韻語陽秋序〉曰：

¹⁷⁸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90，卷5，頁1a-21b，總頁483-493。

¹⁷⁹ 相關研究參見顏崑陽，〈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年7月），頁43-68；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淡江中文學報》第18期（2008年6月），頁279-302；顏崑陽，〈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東華漢學》第34期（2021年12月），頁1-72。

子美詩雖比物敘事，號為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理。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謂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談，童稚之謠，或足傳信於後世，而況文士之辭章哉。¹⁸⁰

「言」與「事」之間的離合，尚須以「理」相衡。沈洵一方面否認絕對的「寫實性」，另一方面卻認可讀者的裁斷能力。如此一來，「信」亦即「忠實性」(fidelity)的測量和判斷，就成為文本與讀者協商、斡旋的結果。這不失為一種折衷的回答。然而，作為文學研究者，對於任何經驗再現及其再現系統理應保持批判的距離。以本文討論的個案為例，「苦」一旦成為書寫的重點（如獄中種種生活經驗），甚至是作品的美學特徵時，作者自述如所謂「聊作患難圖繪」就變得可疑亦可議，有必要仔細予以辨析和審視。此外，嵇永仁及諸子的「獄中書寫」作於艱難困厄之際，於是對歷史再現相關議題的推敲和叩問，便難以局限純理論的研析，而牽涉閱讀、詮釋的倫理問題，在在反映文學詮釋的道德和政治意涵。¹⁸¹

六、結語

本文以嵇永仁為中心，探討了「三藩之亂」期間陷閩諸員的獄中詩歌。在勾稽嵇永仁陷獄始末及其書寫自覺的基礎上，本文將其獄中所作詩歌置於「詩史」傳統中考察，指出《百苦吟》中的日常化敘事，及其書寫污穢、不潔、鄙陋之物的詩學表現，一方面於文學史上的苦

¹⁸⁰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79-280。

¹⁸¹ 有關嵇永仁其人其作如何為當時後世讀者所接受和詮釋，參見邱嘉耀，〈嵇永仁「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及其接受詮釋——兼論清初雜劇抒情性的文化建構〉，頁237-250。

難敘事與獄中書寫（特別是同樣處於時代板蕩的文天祥）前有所承，另一方面，永仁諸子就其觸目所及，直書史事，鋪排獄中諸「苦」至於百首，則從風格、題材和體量上顯示出「詩史」新的變化。

在釐析嵇氏獄中詩歌的文學史地位後，本文轉而討論以詩歌再現歷史的種種問題，亦兼及「詩史」書寫倫理之反思。細讀永仁獄中詩歌，有一現象頗堪關注，亦即其歷史經驗與詩歌內容之間依約可見的分歧和斷裂。由於語言傳達之經驗必然經過一定程度的「翻譯」，因此文學語言本身即內建某種虛構的特質。儘管在後現代歷史學家的立場看來，歷史敘述或書寫有其文學性，也難以擺脫建構和再現的可能；在理論層面，似乎仍須區分「歷史事實」（真實發生過的事）和「歷史著述」（歷史的文字再現）二者。事實上，本文第五節的工作，正是嘗試逼近「三藩之亂」此一部分的歷史真實之過程。嵇永仁作為「詩史」研究案例的特殊性在於，記載其獄中生活和制度的文字十分豐富，然而相關內容或因應文體成規、發言語境、受文對象等，而呈現畸輕畸重的現象，換言之，部分內容特別得到強調。儘管如此，我仍嘗試從諸子於獄中書寫下來的文字，以及相關文字所呈現的「歷史」與「歷史真實」之間的縫隙或差距，對讀、拼湊、逼近那一段於今已相當遙遠的過去。相對於探討紀實與虛構之間的差異，本文更希望藉助前賢有關經驗的「想像性」或詩歌語言「隱喻性替換」的機制等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嘗試體貼嵇永仁等歷史人物的複雜處境。我認為，要認識他們複雜的處境，首要步驟是「問題化」其書寫／再現系統和機制（如詩歌與書信之間的差異），並強調不同文體在再現歷史時的可靠性。與詩人及其筆下再現的歷史保持「批評的距離」，並不是出於質疑的意圖甚至是虛無主義的立場，反而是為了把握其人其作的複雜性。¹⁸² 譬如說，諸子獄中詩歌再現的視聽經驗，便即在相當程度

¹⁸² 其中一名審查人提醒，讀者（研究者）或受限於其所認識的歷史真實，進而誤以為詩作情理

上拓寬我們對古人有關真實與「詩史」觀念之理解：起碼在嵇永仁他們看來，基於聲音、聽覺經驗以再現其所遭逢的當下的歷史，其實仍不失其「寫實性」，亦與其意欲達成的見證功能無所違礙。

以詩歌（文學）作為歷史見證先天面臨兩種倫理的衝突：書寫的倫理與再現的倫理。前者是見證和「詩史」所以成其所是的根源所在，沒有紀錄時事的創作衝動，就沒有相關文字的誕生。後者則是以文字——特別是文學語言——轉譯個人在生活領域遭遇的種種經驗時必須面對的問題。陳平原曾指出，有些古人要求「詩史」必須反映現實，乃「把文學混同於歷史，用考據學家的眼光來讀詩」，並指出在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影響下，主張「感事」而非「紀事」的「詩史」尤其可貴，原因在於它們對詩人心境的捕捉和呈現。¹⁸³ 儘管嵇永仁的原初創作意圖，並非側重個人心境的呈露，創作於「三藩之亂」尚未平定之際的《百苦吟》，仍在相當程度留下當時下層文人精神史、心態史的痕跡。高友工認為「抒情美典」的理想情況是：以象徵形式揭示作者創作當下的心境，並指出「這種心境本無實相可言，又無實相為證，因此不必說真偽是非」。¹⁸⁴ 這或許契合了某種強調性情的「詩史」範式。然而，閱讀嵇永仁的絕命詩「此身若遂沈淪死，留與寒家子弟看」二句，¹⁸⁵ 可見對詩歌見證功能的肯認，本身就參與構成詩人的

或邏輯未洽。所言甚是。德國接受美學學家 Wolfgang Iser (1926-2007) 曾區分「同時讀者」(the contemporary reader) 和「後世讀者」(the later reader) 兩類讀者，認為這兩種讀者所知悉的文本資訊並不一致，前者是「參與者」(a participant)，後者僅為「觀察者」(an observer)。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78. 中譯本參〔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94-95。

¹⁸³ 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0-275。

¹⁸⁴ 高友工，〈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頁106。

¹⁸⁵ 〔清〕嵇永仁，〈囑林翁能任為余珍重殘詩〉，《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145，卷1，頁30b，總頁69。

心態。¹⁸⁶ 可以說，「詩」與「史」的糾葛——如何以詩寫史？為何以詩寫史？——既以理論及實踐為場域，也發生在詩人的觀念層面。

我們或許可以藉由比較以說明《百苦吟》再現歷史的特點。綜合以上考察，可知《百苦吟》雖創作於「三藩之亂」期間，卻非以再現戰爭經過和場面為重心。相對許旭《閩中紀略》嘗試捕捉耿精忠、范承謨雙方交惡以至啟釁的歷史節點，身陷囹圄的嵇永仁毋寧採取一種內在、向下的視點，以書寫他所親歷的當代史。於是，《百苦吟》再現的「三藩之亂」並不壯闊恢宏，其所觀察及刻劃的，更多是獄中日常生活的細節，反映出時代板蕩裡知識分子的特殊心態。相對而言，嵇永仁的史識——廣義的歷史判斷——更多反映於詩歌以外的其他文類。當然，此處所謂「日常」必須以某種辯證的目光看待：無論就古代文人的生命經驗，還是古典詩歌傳統而言，那些以污穢、不潔、鄙陋之物為核心，由詩人敘述下來的「日常」，自然是特定歷史時刻下的特殊產物。可以說，《百苦吟》對獄中生活的鋪敘和書寫，一方面合轍於清詩的日常化趨勢，¹⁸⁷ 另一方面，又由於與「詩史」理論的媒合，因而成為歷代「詩史」的特殊創作實踐。

（責任校對：沈旻儒）

¹⁸⁶ 有關絕命詩的價值和意義，參見張暉，〈死亡的詩學——南明士大夫絕命詩研究〉，頁 140。

¹⁸⁷ 參見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文學評論》2020 年第 5 期（2020 年 9 月），頁 130-14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宋〕文天祥撰，劉文源校箋，《文天祥詩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宋〕李復，《潘水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11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明〕楊慎撰，王大厚箋證，《升庵詩話新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明〕瞿式耜撰，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蘇州地方史研究室整理，《瞿式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收入唐圭璋彙刊，《詞話叢編》，冊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冊14，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
- 〔清〕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薑齋詩話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清〕吳偉業編，《太倉十子詩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384，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據蘇州市圖書館藏順治刻本影印。

- 〔清〕汪學金輯，《婁東詩派》，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9，冊 3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年，據清嘉慶九年（1804）詩志齋刻本影印。
- 〔清〕周亮工，《藏奔集》，收入朱天曙編校整理，《周亮工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
-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 97，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
- _____，《范忠貞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據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清苑劉氏刻本影印。
- 〔清〕勒德洪等撰，《平定三逆方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冊 35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 〔清〕清實錄館臣編，《聖祖實錄》，《清實錄》，冊 4-5，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許旭，《閩中紀略》，收入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冊 27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
-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清〕嵇永仁，《續離騷》，收入鄭振鐸纂集，《清人雜劇初二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 年。
- _____，《抱犢山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冊 131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_____，《抱犢山房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1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據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影印。

- 〔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嵇永仁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
- 〔清〕焦循，《劇說》，收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冊8，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
- 〔清〕黃宗羲撰，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清〕趙翼，《皇朝武功紀盛》，收入《粵行紀事（及其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錢儀吉，《衍石齋記事續稟》，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50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刻咸豐四年（1854）蔣光燾增修光緒六年（1880）錢彝甫印本影印。
- 〔清〕魏源撰，韓錫鐸、孫文良點校，《聖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二、近人論著

-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 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王璦玲，《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
- 朱義胄述編，《春覺齋箸述記》，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4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 吳婧、賀峰，〈論嵇永仁的詩歌風格——以組詩《百苦吟》為例〉，《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5期，2013年5月，頁48-50。
- 李梅，《嵇永仁及其戲曲創作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

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杜桂萍，《清初雜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邱嘉耀，〈嵇永仁「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及其接受詮釋——兼論清初雜劇抒情性的文化建構〉，《臺大中文學報》第78期，2022年9月，頁209-264。

柏樺，〈明清州縣的監獄〉，《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4期，2002年11月，頁119-133。

柯慶明，〈苦難與敘事詩的兩型——論蔡琰「悲憤詩」與「古詩為焦仲卿妻作」(續完)〉，《中外文學》第10卷第6期，1981年11月，頁162-173。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試論「知」與「言」〉，《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18。

_____，〈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9-38。

_____，〈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90-142。

_____，〈律詩的美學〉，《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217-264。

張家禎，《戲曲之「用」——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的入世姿態與自我形象建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20年。

張惠思，《文人游幕與清代戲曲》，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年。

張暉，〈死亡的詩學——南明士大夫絕命詩研究〉，《文學評論》2013年第4期，2013年7月，頁132-142。

_____，《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

- 聯書店，2016年。
- 許暉林，〈物、感官與故國：論明遺民董說《非煙香法》〉，《考古人類學刊》第88期，2018年6月，頁83-108。
- 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59-279。
- 陳亮亮，〈乾嘉戲曲中的南明忠臣再現：瞿式耜與《鶴歸來》〉，《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0年第1期，2020年1月，頁51-60。
- 陳國球，《抒情中國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 陸林，〈清初戲曲家嵇永仁事跡探微〉，《中國戲曲學院學報》第36卷第2期，2015年5月，頁22-27。
- 黃海章，《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
- 黃雅雯，《漢代監獄文學研究——以鄒陽、司馬遷、馮衍、蔡邕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 劉鳳雲，《清代三藩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
- 滕紹箴，《三藩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 潘怡帆，〈見證，或文學的任務〉，《中國現代文學》第39期，2021年6月，頁7-24。
- 蔡英俊，《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與「含蓄」的美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
- _____，〈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12月，頁239-271。
- 蔣寅，〈生活在別處——清詩的寫作困境及其應對策略〉，《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2020年9月，頁130-141。
- 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顏崑陽，〈論唐代「集體意識詩用」的社會文化行為現象——建構「中

國詩用學」初論》，《東華人文學報》第 1 期，1999 年 7 月，頁 43-68。

_____，〈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行為模式——建構「中國詩用學」初論〉，《淡江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8 年 6 月，頁 279-302。

_____，〈中國古代士人階層「詩式社會文化行為」的實踐情境結構〉，《東華漢學》第 34 期，2021 年 12 月，頁 1-72。

魏伯全，《清初文人的邊緣書寫：以尤侗、嵇永仁、廖燕劇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 年。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著，陳蘇鎮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英〕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著，黃劍波、柳博贊、盧忱譯，《潔淨與危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德〕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Zhang, Ying. *Religion and Prison Art in Ming China (1368-1644): Creative Environment, Creative Subject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0.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n Ji Yongren’s (1637-1676) Poems from Prison: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Poetic History”

Ka-Yiu Yau*

Abstract

Ji Yongren 嵇永仁 was a victim of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Previous scholarly focus has primarily been on Ji’s plays, leaving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his prison poetry, specifically the poetry collections “The Chant of Jiji” (*Jiji yin* 吉吉吟) and “The Chant of a Hundred Sorrows” (*Baiku yin* 百苦吟), largely unexplored.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Ji’s writing concepts and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his prison poet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dition of “Poetic History” (*Shishi* 詩史). It argues that the poet’s experience in prison not only becomes a source of creative material and subject matter, but also that it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poetic aesthetic characterized by filth, impurity, and vulgarity. Despite this aesthetic style being distinct from that found in traditional poetics, due to the public significance of Ji and others’ shared prison experience, it paradoxically came to be embraced within the Confucian value system, becoming a unique practice within the realm of “Poetic History” theory. Drawing on accounts of Ji’s prison life beyond his poetry, this article

* Research Associate, Mr. Simon Suen and Mrs. Mary Suen Sino-Humanitas Institut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urther discusses the sensory experiences represented in his poems, as well as the function of poetry (re)creating activities within the prison. It explores how the poet selectively captures and reassembles specific units of experience, prompting a reflection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writing of “Poetic History” theory. This study moreover argues that Ji’s prison poetry reflects a new variation of “Poetic History” and vividly portrays the complexities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 as well as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esthetics, and ethics.

Key words: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Poetic History,”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ensory experience, “Singing in Harmony,” Qing poetry